

## 内 容 提 要

澳门以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历史成因及社会人口构成，开埠 400 多年来，既发挥了作为著名东西方贸易港口的作用，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的城市建筑在某些方面则集中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遇、碰撞和融合。

本文主要通过从开埠至 1848 年间澳门的城市建筑来论述中西文化的交融，其中包括澳门的地理概况、各类建筑物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等。全文共分成三章：第一章“澳门城市发展概述”，通过近代考古发掘的成果来说明珠江三角洲的形成，特别是珠江三角洲西边的滨海线不断外移，从而形成了澳门半岛特殊的地理条件。在此前提下也对澳门城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概述。第二章“澳门的城市建筑”，主要论述澳门城市建筑的创建和历史演变，将 1848 年前主要的历史建筑分类进行论述，其中包括教堂、庙宇、炮台和民居。第三章“从澳门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融”，首先论述了澳门天主教城和华人居住区的形成和发展，然后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中西文化在都市格局、街区和单幢建筑物上的融合。最后的结论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形成了澳门的文化特色，其特点是同时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澳门文化特色又普遍在城市的建筑中显示出来。

关键词：澳门 城市建筑 文化交融

## 前 言

在澳门城市建筑研究方面，澳门著名历史学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神父发表了大量有关历史的著作，尤其是教堂和街区的历史。还有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对澳门历史的梳理而编写的澳门编年史。他们的著作在澳门城市建筑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在城市建筑历史方面，如科斯塔(Maria Costa) 的《澳门建筑史》、巴拉舒(Carlos Baracho)的《澳门中世纪风格的形成过程》和汤开建的《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等。在建筑文化方面，如王兆君(Wong Shiu Kwan) 的《澳门建筑：中葡合璧相得益彰》和布尔奈(Diogo Burnay) 的《变动与建筑：澳门的建筑与殖民主义》等。还有在考证方面，谭世宝对澳门开埠前的“村” 和澳门三大庙宇的考证等。

澳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和中转站，这是得到众多学者承认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汇或交融对澳门的城市发展有甚么贡献，澳门的城市建筑又如何反映中西文化的融合，这是本文尝试论述的课题。建筑物是一个社会最立体和最质感的表现，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可引用下面这段话说明：“建筑差不多是一个国家完美的历史记录，每一座建筑物都能捕捉那个地方的气候、地理及该社会的经济、科技和政治情况，和人民的道德价值、哲学思想、美学观。”<sup>1</sup>从澳门保存下来的大量建筑遗产，我相信可以从中获取足够的信息完成有关课题。

本论文的研究是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三个层面来论述：从时间来区分，本文的研究范围是从澳门开埠至 1848 年，这是由于有关 1848 年后的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论著较多，而且政府档案和文献都有详细的记载；从空间来区分，本文的研究范围集中在澳门半岛，并以分层的方法去论述，首先是澳门整体城市发展的概述，然后是各类建筑的叙述到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的论述；从文化层面来研究，是以城市区域的形成为基础，通过各类建筑物所代表的文化或其文化内涵在同一城市空间的共存和融合，最后是这种共存和融合所形成的普遍价值。

就本论文的学术价值来说，论文的选题是在导师李金明教授所长期专注从事的“中外关系史” 研究方向下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课题——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导师的谆谆指导下，本文第一次尝试从澳门的城市建筑遗产来论述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肯定了建筑遗产对形成独特城市文化的贡献。在有关澳门的学术研究方面，希望能够推

---

<sup>1</sup> 转引自龙炳颐《香港古今建筑》，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页1。

动对澳门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另外，在论述的过程中，从地理环境的形成、社会经济因素和庙宇的创建来论证，否定了澳门在开埠前，已有“村”存在的问题。

目前，澳门正在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澳门的建筑遗产所体现的中西文化交融，论证其所代表的普遍文化价值，对澳门的申报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本土文化如何应付竞争，各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如何定位，这些都是极为迫切开展的研究课题。有关这方面课题的研究，澳门正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澳门作为近代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城市，在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各种文化如何交汇、碰撞和融合，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澳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模型。因此，本论文对澳门文化的解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论文从开题到完成历时两年，原因是本人从2000年开始参与香港大学建筑系的建筑保护课程的教学工作，但最主要是去年为了统筹澳门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面对大量而复杂的工作使论文的撰写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在此非常感谢导师李金明教授的帮助和一再催促，还有香港大学建筑系龙炳颐教授的鼓励，使本论文得以完成。

# 第一章 澳门城市发展概述

## 第一节 地理概况

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处广东省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毗邻珠海市，北距广州市 145 公里，东距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约 78 公里（约 42 海浬），其区域范围位于东经  $113^{\circ}31'36''$ — $113^{\circ}35'43''$  左右，北纬  $22^{\circ}06'39''$ — $22^{\circ}13'06''$ 。

澳门地区由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所组成。凼仔岛位于澳门半岛东南偏南约 2.5 公里，路环岛则在凼仔岛以南约 2 公里。澳门地区总面积约 25.66 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半岛 8.61 平方公里，凼仔岛 6.54 平方公里，路环岛 7.56 平方公里，路环与凼仔之间的路凼城约 2.95 平方公里。<sup>1</sup>澳门面积相当于香港的六十三分之一、新加坡的三十七分之一，从地域规模来说，是一个相当狭小的城市。

澳门地区地势不高，以丘陵、台地为主，其地理形成与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密不可分。珠江三角洲是在海侵、海退的多次旋回中发育起来的。据地理学家分析，距今约 40000—32500 年，珠江三角洲全境为陆地，西江、北江、东江、潭江等河流下切，形成平行岭谷地貌。距今 32500—22000 年，珠江三角洲约有 1/5 面积被海侵，海水沿河谷入侵，构成 3 条溺谷。距今 22000—7500 年，南海海面大幅度下降，珠江三角洲全境又上升为陆地。距今 7500—5000 年，再次发生海侵，整个珠江三角洲重被海水淹没，当时的右海岸线至少延伸至广州及佛山一带，溺谷湾深入到羚羊峡东面的广利。同时河口发生淤积，河水及海水带来的泥沙充填溺谷，形成近代三角洲平原。<sup>2</sup>在近代珠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以前，澳门地区只是几个孤悬大海，远离陆地的小岛。随着近代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滨海线的不断外移，澳门地区也慢慢地向陆地靠近，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一部份。

距今 4000 年前后的滨海线，亦即是新石器晚期的海岸线。这个时期的海岸线，随着珠江流域上、中游人口逐渐增加，水土流失加快而不断淤积前伸。经过约 2000 年的淤积，西、北三角洲的滨海线已推进至顺德县龙江、都宁，西海，番禺县紫泥、沙湾、市桥、石楼、莲花山、化龙、广州东郊南岗一带。<sup>3</sup>距今约 2200 年前的汉代滨海

<sup>1</sup> 崔世平、赵炳时：《21 世纪澳门城市规划纲要研究》，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1999 年，页 5。

<sup>2</sup> 魏清源等：《世纪之交的珠江三角洲行政区划》，广东地图出版社，1997 年，页 6。

<sup>3</sup> 李平白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 年，页 73。

线，通过考古发掘，在西、北江三角洲中部的顺德县发现了多处汉代遗址，因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海岸线位于现顺德市附近。至唐代距今约 1400 年的滨海线，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石棋南沙涌口有唐代王博墓，而且广州东郊庙头村隋代已建南海神庙（菠萝庙），因此，唐初西、北三角洲的滨海线大致在南华—昌教—龙涌—桂州—石棋—庙头附近<sup>4</sup>。至宋代距今约 1000 年的滨海线，西、北江三角洲的滨海线大致在新会双水—小冈—礼乐—江门外海—中山古镇—曹步—小榄—大黄圃—潭州一带<sup>5</sup>。明代滨海线继续南移，并已靠近五桂山（香山岛）。随着三角洲的进一步淤积前伸，清代初期，五桂山已把西江出海和北江出海口分隔为一西一东。

澳门原为位于香山岛南隅、悬于海中的孤立小岛，后因珠江三角洲西边的海滨线不断南移，从西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地淤塞堆积，形成了一道长约 200 米的砂堤与香山岛连接，使原来的澳门岛变成为一个半岛。因此，通过上述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发育过程和澳门与香山岛之间的地理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在澳门开埠以前，澳门只是香山岛的一部份，澳门诸名当然就不见于经传。根据薛翹《澳门记》载：

“自香山县鳳栖岭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为濠镜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断，亘沙堤如长桥，曰莲花茎。茎末山又特起，名莲花山。又伏又起，中曲拗，长五六里，广半之，直伸艮，是称澳焉。”<sup>6</sup>

澳者，舶口也。因之，澳门当时为香山的舶口之一。

澳门原是悬于海中的孤立小岛，后因西江带来的泥沙堆积，形成了一道长约两百多米的砂堤与大陆连接，使原来的澳门岛变成为一个半岛。18 世纪中叶，澳门半岛的西侧已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填海工程。但是，当时于西北角的青洲还是一个小小的离岛，已修建了路堤与半岛连接。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填海工程，澳门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形态。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南北长约 4 公里，东西最宽约 2 公里，中有小山丘，从东北到西南分别是望厦山、东望洋山、西望洋山和妈阁山。此外，中部还有大炮台山，西北有青洲山，东部有马交石山等，其中以东望洋山为最高，海拔约 90 米，山顶建有东望洋灯塔。

澳门半岛在珠江出海口的位罝，在它西北 1 公里许，有个郁郁葱葱的小岛，名叫青洲。在它的东方，近有东澳山、九星洲山及九洲洋，还有伶仃山及伶仃洋，更远处是通往广州的门户 ----- 虎门。在它的西方，有对面山、马骝洲、灯笼洲、文湾山、磨刀山等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并有通往广州的另一个门户 ----- 虎跳门。在它的南方，

<sup>4</sup>李平白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 年，页 75。

<sup>5</sup>李平白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 年，页 75。

<sup>6</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 年，页 26。

有舵尾、鸡鸚、横琴、九澳等四岛面面相对，海水纵横其中，成“十”字状，故被称为“十字门”。

从澳门的地理位置和珠江三角洲西边的地理变化来分析，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澳门城的建立和限制它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

## 第二节 澳门城市的建立与发展

澳门虽然是一个小城市，但是自 16 世纪起，国际的、区域的和本土的历史变化在这里有着最实际和敏感的反映，形成了澳门最独特的城市风貌。

1999 年 12 月 20 日以前，澳门处于受葡萄牙行政管辖的政治状况，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一直受到东西方多种文化（亚洲、地中海和非洲）的影响。

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澳门的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了从新石器晚期的夹砂陶、汉至六朝的“五铢钱”、唐宋的青釉陶到清朝的铜钱等。证明澳门海岛有人类活动的可追溯至 5000--6000 年前，而且与珠江三角洲古越族先民文化休戚相关、一脉相承。<sup>7</sup>也证明了在葡萄牙人到达以前，澳门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的存在。

澳门开埠前的“澳门地区”<sup>8</sup>已属于中国领土，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直到明朝中叶澳门开埠以前，这里并没有形成一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或单位，充其量仅是一些自然形成的、人烟稀少的聚落而已。<sup>9</sup>

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通过与当地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取得了大量的中国货物转贩至欧洲，赚取巨额利润。为了更大的利益，葡萄牙人积极寻找取得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途径，继续拓展其在远东地区的贸易航线；另一方面通过葡萄牙与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协议，发展在中华帝国的传教事业。因此，从佐治·欧华利(Jorge Alvares) 于 1514 年第一次到达珠江口的屯门岛 (Tamao) 作试探，随后 1517 年葡属马六甲总督第一次遣使中国，要求与明政府建立定期贸易关系被拒，经双方武力较量而败走浙闽一带，直至 1553 年才开始在澳门取得立足点。<sup>10</sup>并开始了东方与欧洲关系的新篇章，把澳门作为与日本、印度贸易的转运港或商站，为这些航线提供商品和市场。

<sup>7</sup> 杨式挺：〈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载于《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学术研究出版社，1995 年。

<sup>8</sup> “澳门地区”指澳门半岛、仔和路环的海陆区域。

<sup>9</sup> 谭世宝：〈关于开埠前澳门半岛上的“村”的传说探真〉载于《文化杂志》第 26 期，澳门文化司署，1996 年。

<sup>10</sup>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页 29。

有关葡萄牙人如何开始在澳门居留的历史众说纷纭，直至今今天仍然缺乏一个确定的日期，唯一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中期来到澳门，自此以后的四百多年里，尽管澳门经历了几次的经济兴衰，葡萄牙人都从未离开过澳门。在鸦片战争以前，葡萄牙人在澳门从事的所有活动都受到明清政府的制约，包括城市建筑方面。明朝政府于 1573 年建立关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澳门的葡萄牙人。

葡国人刚到达澳门时，澳门半岛只有稀少的流动人口聚居，并没有形成村落。葡国人开始在内港地区建起了简陋的土木结构建筑物。由于教会的力量起主导的作用，首先建起的公共建筑物就是木结构的教堂，葡国人的住宅群慢慢地教堂的周围建立起来，并辐射出去，形成了澳门的城市雏型，也即是天主教城的雏型。那个时期的葡式住宅和公共建筑现在已不存在，甚至连有关的图象记录也没有留下。城市逐渐形成之后，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堂就不再是简单的土木建筑，而是具有一定的水准的砖石结构。在 1562 年 - 1634 年间，葡人在澳门投资兴建了一系列教堂，先后建成圣保禄（大三巴）、圣望德（疯堂）、圣老楞佐（风顺堂）、圣方济各（伽思栏堂）、圣奥斯定（龙嵩庙、大庙）、圣多明我（板樟堂）、圣安多尼（花王庙）和圣嘉勒修院（尼姑庙）等 8 座教堂。继教堂之后又建起的公共建筑物有市政厅、仁慈堂等。17 世纪后，为了防御其它西方列强的进攻，葡萄牙人陆陆续续地修建了大大小小的炮台和城墙。先后建成伽思栏炮台、南湾炮台和小炮台（沙梨头炮台）、大三巴炮台、东望洋山炮台（松山炮台）和西望洋山炮台、妈阁炮台和圣地亚哥炮台，这些都是在明朝政府不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 1622 年荷兰人发动的进攻，使明朝政府默许炮台和城墙的存在。不过，澳门的城市在 17 世纪末和整个 18 世纪基本上没有甚么发展。其原因一方面是澳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清政府在 1749 年宣布未经批准不得在澳门建造新房，只允许对已存的建筑进行必不可少的维修工程。同时，城外的中国居民点不断增加，人口不断膨胀。直至 18 世纪后期，由于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以及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一些吸收了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才陆续建成，如圣若瑟修院教堂。19 世纪初，教会重组后，重建了主要的教堂，用耐用材料代替了以前的土坯。如圣老楞佐教堂、圣奥斯定教堂和圣嘉辣教堂。澳门作为一个鸦片贸易的中心，很多外国公司的到来，造成很多具有高水平的新型建筑在南湾兴建起来，包括豪华的别墅、商业楼宇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澳门城市建筑中最辉煌的时期，澳门成为远东地区最繁华，最漂亮的花园城市。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香港的开埠，澳门作为中外贸易的商业港口的优势也随之失去。此外，由于清政府的衰弱，澳门渐渐地从政治上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葡萄牙政府从根本上控制了澳门，教团组织被取缔，市政厅也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总督掌握实权，代表了葡萄牙政府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力。于是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城市发展和改良计划，澳门从此开始有了整体的城市计划。当时最重要的工程包括修建望厦马路、内港和西望洋山填海、开山和筑路。

19 世纪后期，澳门作为移民和苦力贸易的中心，经济又再度活跃起来。同时，澳门继续成为西方各殖民者的渡假胜地。许多豪华住宅均出现在这个时期，这些楼宇既具有城市的风貌和中国式的空间结构，又有西方古典式的拱形骑楼、装饰、中楣、三角楣、主柱、壁柱及柱顶盘。在公共楼宇和机关楼宇中、较为突出的是伯多禄五世剧院、仁伯爵医院、陆军俱乐部、水警兵营、峰景酒店、卫生司办公楼、警察厅和镜湖医院。形式的选择基于各种不同的风格，从古典折衷主义到西方的装饰复兴主义。另外，中国传统建筑在城市和原来华人村庄的聚居点里继续发展。新建修葺和扩建了一些庙宇，如沙梨头的关帝庙、土地庙和包公庙、大炮台山坡的哪咤庙，以及马交石附近的天后庙。在商业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式建筑——塔型当楼。其外形像炮楼，有小气窗和波浪形的塔顶，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炮楼建筑相似。

20 世纪初期，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公共工程，包括填海扩地，建造码头港口和公路，抽干沼泽地、安装公共照明以及兴修花园等，还有建设纵横交错的马路网区，供水系统和下水道系统。新马路就是建于 1920 年，并一直成为澳门最主要的马路。而澳门建筑文物最主要的风格之一——现代主义于三十年代传入澳门，在新马路的周围到处可以看到体现着装饰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将城市建设的控制权交给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商和发展商手中，澳门原来的城市风貌又慢慢地被毫无美感的盒式建筑物所侵蚀和破坏。与此同时，澳门政府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长远的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和配合原有的历史城区，使很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澳门文化财产保护法令的颁布为止。



## 第二章 澳门的城市建筑

### 第一节 教堂建筑

#### 一、圣安多尼教堂(Church of St. Anthony)

圣安多尼教堂座落在圣安多尼广场，位于贾梅士花园(Luis de Camoes Garden)所在的小山丘上，在旧沙梨头堡垒一侧，教堂正门朝向为西南方，与贾梅士前地构成一直角，它是澳门最古老的三间教堂之一。在《澳门记略》一书中，张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这个教堂：“北隅一庙，凡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庙。”<sup>11</sup>因此华人都叫该堂作“花王庙”（花王堂）。

据施白蒂女士的看法，它可能是澳门的第一座教堂，教堂的雏型建于1562年<sup>12</sup>。有关圣安多尼教堂的建立时间，其它文献的记载是在1565年耶稣会传教士建造第一所住宅时，其雏型就已经存在。按照蒙塔纳神父(Padre. Montanha)的说法：“靠近圣安多尼小礼拜堂，用茅草盖成了第一座教堂，与澳门其它民房无异”<sup>13</sup>；作者耶稣会传教士多明戈斯·桑托斯(Domingos dos Santos)在其名为《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的著作中这样写道：“1565年年底，耶稣会的寓所由佩罗·金特罗(Pero Quinteiro)家迁往其它的住宅。这些住宅同样也是土房，以木头和稻草作为屋顶，靠近简陋的圣安多尼小礼拜堂”<sup>14</sup>。

从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圣安多尼小礼拜堂在1565年就已经存在，而在它附近的圣安多尼教堂则是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创建。我们到该教堂所在的地理位置，刚好是俯瞰着内港的沙梨头之上的大炮台山山坡西南边的背阴面，可能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形成聚落的第一个地区。

文德泉神父提到，该教堂在1608年进行了重修，其门楼前壁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字。<sup>15</sup>不过，正如现存教堂庭院的石头十字架所示，第一座石头的教堂建于1638年，就在现存教堂的原址上。<sup>16</sup>

18世纪开始，由于荷兰和英国在远东地区的竞争，葡萄牙失去了海上霸权，与

<sup>11</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150。

<sup>12</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页17。

<sup>13</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页47。

<sup>14</sup> Domingos dos Santos：《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4年，页7和页40。

<sup>15</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123。

<sup>16</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页48。

日本商业贸易也断绝了，加上荷兰人夺取了马六甲，使澳门陷入了衰退之中，教会的收入随之也大幅度减少。此外，由于澳门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侵袭，在袭击澳门的多次台风中，1738年的那一次特别猛烈，澳门的大多数教堂遭到严重的损坏<sup>17</sup>。

1739年被唐·若奥五世(D. Joao V)任命为澳门主教的伊拉里奥·德·圣·罗萨(Hilario de Santa Rosa)修士，应教皇本多十四世(Bento XVI)的要求，对当时澳门教区的情况作了以下的描述：“万能的十字架(果阿之神)……我主上帝在召唤我，特别是现在在印度省损毁情况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看来，我注定是在它濒死前给它涂油祝福而不是去统治了。”主教堂以及一些其它教堂的损坏情况极为严重，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已无法正常进行了。<sup>18</sup>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圣安多尼教堂和其它教堂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澳门市议会的支持。1795年，印度总督给澳门市议会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它修复圣安多尼教堂和圣老楞佐教堂。有一封寄往印度的，日期为1797年12月28日的信要求印度方面批准修复这两座教堂的工程计划，表明市议会已经遵守了印度总督的命令。<sup>19</sup>

与澳门所有教堂的命运一样，圣安多尼教堂在1809年也遭受了大火洗礼。过后，在罗马天主教徒和非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徒的捐助下，教堂于1810年得到了重建<sup>20</sup>。1874年的台风及以后的大火使教堂受到破坏，教堂在清光绪元年(1875)又进行修建，其规模一直保存到现在。

1930年教堂再次进行了修复，似乎就在这一年，塔楼和前壁作了重大的修改<sup>21</sup>，后者使用了当地人叫作“水刷石(Shanghai Plaster)”的类似麻石的材料作饰面。在唐·若瑟·科斯塔·努内斯(D. Jose da Costa Nunes)任澳门总督期间，圣望德教堂、主教堂和圣若瑟修道院教堂的前壁也作了同类的改动。

关于1638年前教堂的建筑形式，我们现在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1810年的情况也如此，只知道墙壁是用板条和灰浆建成的，这是19世纪初澳门建筑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sup>22</sup>。到了19世纪后期，这座教堂可能成了当时一座比较惹眼的宏伟建筑，就象当时印度省的所有其它教堂一样，用雪白的灰浆涂墙，描画装饰。这种方式在这个地区持续了一个半多世纪。

现在的教堂只有一个中殿，尽管在1930、1951和1953年都分别进行过修复，而

<sup>17</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页126。

<sup>18</sup>同上，页128。

<sup>19</sup>同上，页198。

<sup>20</sup>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页23。

<sup>21</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页89。

<sup>22</sup> Antonio Bacarro：《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e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1992,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Volume II, p.263。

目获得了很大的改变，但考虑到其内部使用的材料，用雪白的灰浆粉刷，木屋顶上面的天花有打了孔的窗花格，供屋顶通风之用，故相信它仍然保持了 1875 年修复工程中引进的殖民风格。

教堂只有一座钟楼，主门楼前壁顶上是一个三角形的山墙，正中有一个壁龛，壁龛内有一座里斯本圣安多尼(Saint Anthony of Lisbon)的塑像。圣安多尼于 1195 年生于里斯本，原名叫费尔南多·布良斯(Fernando Bulhoes)，是马丁·布良斯(Martim Bulhoes) 和特蕾莎·塔维拉(Teresa Taveira)的儿子，是葡萄牙最广为人知的圣徒。

龙思泰记述了人们在 6 月 13 日庆祝圣安多尼节的情况，这个节日要延续 13 天，游行活动富有军事色彩。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至少到 1833 年为止，圣安多尼像就由神职人员、总督、贵族和军队护卫，他的塑像由四名军官抬着，历时 13 天，每天早上士兵们都等在教堂，以向他表示敬意。游行前一天，市议会提供 240 两银子<sup>23</sup>，刚好是一名陆军上尉的年薪给教区的全体居民，供清洁和宗教活动之需。圣安多尼是受人欢迎的圣徒，特别是在海员之中。有时，崇拜者会因敬慕而跪下双膝，以企求圣安多尼保佑。但由于求拜者心情迫切，他们认为圣安多尼高傲地拒绝了他们的企求，或者有意耽延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圣安多尼像便从座基上被拿了下来，受人诅咒和鞭笞，受人虐待。另一方面，如果祈祷者认为圣安多尼显灵保护了他，就对圣安多尼像三磕五拜，爱护备至，不停地在塑像前烧香点蜡。”<sup>24</sup>

## 二、圣老楞佐教堂(Sao Lourenco Church)

圣老楞佐教堂坐落在风顺堂街上，位于圣奥斯定堂和圣若瑟修道院(Sao Jose Seminar)所在小山的西南坡，前面就是南湾宫(Praia Grande Palace，即今澳督府)，坐北向南。也是澳门三个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是葡萄牙人的航海保护神，在《澳门记略》一书中，张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这个教堂：“此外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归，祈风信于此。”因此华人称此教堂为“风顺堂”。

若瑟·热苏斯·马利亚(Jose de Jesus Maria) 教士说：“从 1559 年到 1560 年，正如回忆录中所记述的，在耶稣会神父的参与和大力帮助下，澳门已经建造两到三座教堂，即圣老楞佐教堂和圣安多尼堂……”<sup>25</sup>。据多份历史记事、文件和历史学家的记述，我们可以断定，自 1557 年澳门“正式”建立到 1560 年，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sup>23</sup>这一数字是相当高的，因为据龙思泰所说，当时圣安多尼教堂副主教的年薪也不过 120 两银子，见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页 178。

<sup>24</sup>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页 180-181。

<sup>25</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89。

最长不超过三年，这三座教堂事实上就已建成。开始时这些教堂的面积都不大，使用了一些易朽性的材料，如使用木板作墙身和以草料作屋顶。圣老楞佐教堂堂区是由澳门耶稣会教士在 1558 年到 1560 年间建成的。

从龙思泰在 1832 年仍然能见到的教堂正面墙壁上的一段碑文可以断定，教堂在 1618 年又进行了重建。<sup>26</sup>

澳门最古老的圣母救赎(Nossa Senhora dos Remedios) 兄弟会就是于 1626 年在圣老楞佐教堂成立的。<sup>27</sup>

1792 年，根据唐·马利亚(D. Maria)的指示，圣老楞佐堂、主教堂和圣安多尼堂获得了每年 50 两白银的补助。<sup>28</sup>

1798 年，根据印度总督 1795 年颁布的一项指令，圣老楞佐堂进行了修建，修建工程由澳门市政厅主持。<sup>29</sup>

据文德泉神父记载，圣老楞佐教堂在 19 世纪进行了三次重建或大型的维修工程。这三次维修计划中，第一次在 1801 年到 1803 年之间进行。由于这个时间很靠近 1798 年，这次维修与上文所指的那一次很可能就是同一次。第二次，也就是形成现在留存的教堂基本形状的这一次，发生在 1844 年到 1846 年之间，维修工程由澳门建筑师若泽·托马斯·阿奎诺(Jose Tomas de Aquino)主持<sup>30</sup>。

1897 到 1898 年间，教堂进行了该世纪内的第三次维修，这次维修工程由公务司主持，公务司的司长是工程师阿布雷乌·努内斯(Abreu Nunes)。20 世纪也进行过多次维修，1954 年又进行了一次，最近的一次是 1966 年进行的，完全由澳门教区出资，对教堂进行了重大的保护性维修。

圣老楞佐教堂是双塔式建筑，教堂建在一高大的花岗岩花园平台上，教堂正面前有两边双合式台阶连接外面街道。教堂主立面可分为三部份，两侧耸立方形塔楼，塔高 21 米，右边装置大时钟，左边设有大铜钟，中间部份高度为 16.5 米，低于塔楼，下层为主入口，上层为唱诗台之大窗，往上则是三角形山花，山花上则以椭圆形徽号收结。建筑物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教堂主体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其长轴为 37 米，短轴为 28 米，短轴两边为小礼拜堂，长轴主要由祭坛区及主堂组成，祭坛区及小礼拜堂之屋顶都是混凝土穹窿。主堂长 27 米，宽 15 米，中间并无立柱，跨度之大为同期

<sup>26</sup>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页 22。

<sup>27</sup>孔德·德·阿诺索：“Jornadas pelo Mundo”，in “De Longe a China”，卷二，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p.744-745。

<sup>28</sup>同上，p.745。

<sup>29</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 年，页 198。

<sup>30</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1979，p.90。

教堂少见。“人”字形坡屋顶结构直接承托在墙体。屋脊高 21 米，檐口高 17 米。瓦屋顶被一木制拱形假天花板遮蔽，假天花板漆成蓝色，并以具透气作用的镂空花线作平面上之划分，打破大面积之单调。主堂两侧墙上有稍为突出之科林斯式壁柱，壁柱间开有彩色玻璃窗，上面刻画的宗教故事既增加宗教特性又可柔和室外阳光，而在各窗上面，位于墙顶处，又相应地开有圆形玫瑰窗，既可采光也可透风。教堂之唱诗台设在正门入口上方，其结构也以木为主要材料，其屋顶为石制，较主堂屋顶为低。

教堂内部装饰得宏伟优雅，与圣奥斯定堂、圣安多尼堂和圣玫瑰堂表达的气氛和情致极为相似，因此，它完成的时代肯定也与前三者差不多，即在 1874 年到 1898 年间(圣玫瑰堂 1874 年，圣安多尼堂 1875 年，圣奥斯定堂 1874 年到 1887 年)，但其更加多样化的设计则似乎是 1897—1898 年改造工程的结果。

### 三、圣母望德教堂(Sao Lazaro Church)

圣母望德教堂坐落在与其同名的前地上，位于大炮台山(Monte) 和东望洋山(Guia)相夹而成的山谷内，这块地方的前面部分原来被称作“开阔地(Campus)”，教堂朝向为西南。最初，它被称作圣母望德(Nossa Senhora da Esperanca) 小礼拜堂，而且坐落在建于 17 世纪的城墙之外。1568 年耶苏会士唐·贝尔希奥·卡内罗(D. Belchior Carneiro) 在其旁边建立一个小医院为这一带居住的麻风病人服务<sup>31</sup>，因为在西方，圣拉撒路(Sao Lazaro) 是麻风病人的保护神，这就是教堂将圣拉撒路(Sao Lazaro)作为其保护神的原因。另外在《澳门记略》的澳门地图中，此位于城外的教堂标示为“麻疯庙”，故华人多称此为“疯堂”。

城墙将中央大炮台和圣·亚努阿里奥(Sao Januario) 山连接在一起，而且，从这儿到圣方济各炮台之间，在望德堂附近，有一座与望德堂同名的城门。

根据同一记述，该教堂与圣安多尼教堂、圣老楞佐教堂都是在 1557 年至 1560 年期间创建的。

1576 年 1 月 23 日，教皇格雷戈利奥十三世(Gregorio XIII)下诏书建立澳门教区并任命耶苏会士唐·贝尔希奥·卡内罗(D. Belchior Carneiro) 为署理主教。

在教堂的前地一侧至今还有一刻有铭文的石座和十字架，上面写着：“希望十字架，一六三七年”。

1726 年圣母望德小礼拜堂进行了维修。<sup>32</sup>《澳门记略》写道：“西南方，城墙外，有一座麻风寺(即望德堂)。寺内有患麻风病的洋人，门口有兵丁把守，看守们每月要

<sup>31</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125。

<sup>32</sup> 同上，p.125。

写出报告。”<sup>33</sup>

龙思泰认为与圣母望德教堂毗邻的“麻疯院”，是澳门仁慈堂最早创设的慈善机构之一，直到1834年还有病人69名<sup>34</sup>。

1885年8月8日总督托马斯·罗沙(Tomas da Rosa)下令拆毁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小教堂，它一直被认作是一座修道院。第二年，在原来教堂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教堂建成了<sup>35</sup>，这是由于在1883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向教会当局请示，要求重建该教堂的结果。<sup>36</sup>

查尔斯·伯克瑟(Charles Boxer)认为，望德堂堂区是在1886年才建立的。<sup>37</sup>后来，到了1923年，它又被划作一个“移动的堂区，具有本市其它三个堂区所有的一切荣誉和特权。”<sup>38</sup>

历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及17到19世纪以来澳门的总体衰落，圣母望德修道院自然也经过了多次维修。

关于该修道院的绘画作品为数不少。以时间顺序排列，我们着重展出的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于1792年到1794年与驻华公使麦克卡特爵士(Lord McCarter)一起游览了中国、克拉克(Clark)和华生(Wathen)大约在1814年<sup>39</sup>以及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1832年的绘画作品。<sup>40</sup>

所有这些绘画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一座中型的修道院，建筑结构简洁，是典型的葡萄牙式修道院平面建筑，左边有一座较矮的方形钟楼，上面覆有四角形金字塔式屋顶，像台上有檐角。

许多绘画都以周围风景如画的环境为背景，这几幅画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修道院的风貌，揭示了其漂亮装饰中的不同之处。

现存的教堂是1886年重建的，那时的教堂与圣安多尼教堂、圣老楞佐教堂、圣玫瑰堂和圣奥斯定堂基本相似，是葡萄牙式的殖民新古典风格，拉毛粉刷装饰，上漆木头天花板。阿诺索伯爵在1894年前参观了澳门后，把刚刚经过重建的教堂描绘为“它们是所有教堂中最漂亮和艳丽的”。1967年，它又进行了修建，主要整修祭坛，

<sup>33</sup> 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150-151。

<sup>34</sup> 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页55-56。

<sup>35</sup> 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125。

<sup>36</sup>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年，页229。

<sup>37</sup> 查尔斯·博克瑟：“当时文件和绘画表现的十七世纪的澳门”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m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香港，Heinemann (asia), 1984, 第10号注释, p.74

<sup>38</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页87。

<sup>39</sup> 同上，p.43。

<sup>40</sup> 同上，p.74。

改建和扩建主教堂，在其两边增建了两道侧廊。所进行的内部和外部整修工程彻底改变了 1886 年时教堂的形貌，教堂的外面全部用“水刷石”涂抹过，这也是其它澳门教堂通常使用的方法，但与澳门的葡萄牙建筑的主要特色之一完全相背，即墙壁用拉毛和粘土，装饰用灰浆、砂和粘土。

山墙的三角面内有环环相扣的半圆曲线，上面有耶稣之心纹章的浅浮雕，顶上是纠缠在一起的皇冠和铁锚图案，期间有一双手掌状物，上面有两个大钉子。

教堂庭院中仍然矗立着原来的十字架，上面镌刻着“Cruz da Esperanca Anno de 1637”（意为“希望之年 1637 年的十字架”）。

#### 四、大三巴牌坊，前圣保禄教堂（The Ruins of St. Paul's, St. Paul Church）

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共 3 名是在 1563 年 7 月 29 日到达并定居澳门，他们是弗朗西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s)、曼努埃尔·特依谢拉(Manuel Teixeira) 和安德烈·平托(Andre Pinto)。他们最先在一位名叫佩德罗·昆特罗(Pedro Quinteiro)的商人信徒家里落脚，“为教士们改建了两间舒适的大厅，并扩建了一座游廊”，“由于最近的教堂也相去甚远，还为教众建造了一座祭坛……”<sup>41</sup>。

两年后的 1565 年，在现在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又建造了一个居住点。关于这件事，以及将房子和教堂搬到“高于”圣安东尼教堂的过程，多明戈斯·桑托斯(Domingos dos Santos)教士在其著作中如是说：“1565 年年底，耶稣会的寓所由佩罗·昆特罗家迁往其它的住宅。这些住宅同样也是土房，以木头和稻草作为屋顶，靠近简陋的圣安多尼堂。这个地点不好，很快就发现需要搬迁。”中国人经常放火焚烧易燃的住宅和教堂，以便偷取里面的东西。然而就重建而言，葡萄牙人的行政管理却处于极其无能为力的局面。重建事宜总要取决于中国官员，而中国官员对建筑物超越临时性的贸易运输的眼前需要则持反对态度。

不过，耶稣会教士们很幸运，他们最后搬往了圣安东尼教堂上面的小山。但这儿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山坡上缺水。巴尔塔萨尔·拉热(Baltasar de Lage)提供了 100 两银子，在教堂的钟楼和侧门之间挖了一口井。应贡萨罗·阿瓦雷斯(Goncalo Alvares)的要求，在唐·安东尼奥·维列纳(D. Antonio de Vilhena)的干涉下，希望改建一座更宽敞和更坚固的用粘土建成的教堂。但是，中国官员对新建筑又表示了反对，他们怀疑葡萄牙人是以建教堂为借口，实际是在建堡垒。最后耶稣会通过行贿的方式达到了目的。

<sup>41</sup> Domingos dos Santos : 《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4 年，页 38。

1572年至1575年或1578年，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前往日本、中国或越南东京湾地区传教的传教士提供膳宿服务，教堂又扩建了一次。教堂早已有了10间通风良好的宽大房间。房间非常舒服，以致在1579年，范礼安(Vallignano)将这天主圣母堂(Madre de Deus)新寓所称为印度和远东地区最好的寓所之一。1582年，佩罗·戈麦斯(Pero Gomes)让人给教堂的屋顶盖上了瓦。”<sup>42</sup>

很可能圣安多尼教堂之上的这个新址就是后来的天主圣母堂(Madre de Deus)修道院和Assuncao de Nossa Senhora教堂所建立的地址。

事实上，1559年到1572年间，佩雷斯神父“曾接到印度省主教安东尼奥·夸德罗斯(Antonio de Quadros)的命令，在澳门为耶稣会教士寻找一个新的住所。这是为了接待连接不断前往日本的传教团的需要，他们为了等待季风季节的来临，往往需要在澳门呆很长的时间。”佩雷拉在其著作的一个注释中引用蒙塔纳神父在Apparatos para a Historia do Bispado de Macau (Arquivo Historico Ultramarino, cod. 1695, fol. 259)中的话时还说道：“神父们住所所开的门，那时是与圣保禄学院联为一体的。”

神父们的住所，连同第一所神学院以及诊所，可能就座落在山坡上，就在现在遗留下来的台阶的一侧，从这儿可以进入圣保禄教堂的庭院，它同教堂的正面面壁一起，在1602年进行了修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建在正面面壁的中轴线上。考虑到耶稣会教士享受到的特权，这一地区可能还有其它属于他们的建筑，所以，这儿就用不着拆毁，而要建造一座宏伟的台阶，以达到盼望已久的宏大的对称。

由于与日本的贸易不断增长，澳门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很有必要在澳门建立一个传教士的远东中心，以便在日本、中国以及世界的这个遥远角落进行传教。教会的视察员范礼安(Vallignano)力主建造一个相当规模的学院和教堂，他在果阿大力宣传他的想法，到1593年，在澳门当地人的财政支持下，他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传教士住所和学院附近的地被填高了，据当时描述：“由于山体的岩石不能作为地基……因此，山坡上建造了牢固厚实的围墙，从而形成了一块很大的地方，用来建造学院和诊所。”由于“学院坐落在半山坡上”，可以“纵目远眺”，而且，“山坡保护它不受不祥的恶劣的风的影响，而只受海上吹来的和风的影响。所以，学院处在了一个清凉的好位置上。”<sup>43</sup>

第一座教堂和学院的工程是由伊纳西奥·莫雷拉(Inacio Moreira)负责<sup>44</sup>，他开始了填地和打地基的工作。在范礼安(Vallignano)神父的领导下，工程进展得有条不紊，

---

<sup>42</sup> 同上，页40-41。

<sup>43</sup> 同上，页42-43。

<sup>44</sup> 同上，页42。



直到 1594 年完成。有人如此描述工地现场：“一面巨大的墙壁后面，有两间很大的房子，房子之间有一个漂亮的院子。房子就象两个堡垒似地凸出来，房子里铺的是木地板。围墙边建有走廊和小房间，围墙建得很气派，而且很高，似乎有跟房子的屋檐一争高下的气势。走下两到三个台阶，就到了山脚的学校，学校里也有漂亮的天井和其它工作场所。它们上面还有更多为官员们设置的安排合理的小房间。面对大门还有另一个四面围住的大院子。这所学院可以容纳 40 名教士，让他们舒舒服服地住下。不包括四间校舍，还有 19 间小房间，两间大房子，两个小教堂和一个布置精良、面积很大的医务室。下面还有另外 7 间小房间。所有其它工作间安排得都非常好。神父(巡查官?) 决定建造一个新的餐厅，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这一个是借来的，如果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再建更多新的建筑物。”

范礼安(Vallignano)神父离开澳门之前，创建了两个不同的机构。一个是与中国副省区相联系的天主圣母堂寓舍，那里有十名神职人员，由梅西亚(Lourenco Mexia)主持。另一个是附属日本省区的圣保禄学院，该学院有十九名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会务视察员，还有八或十名来自日本的学生和一些来自印度的学生，院长是孟三德神父(Pe. Duarte de Sande)。1597 年 9 月在李玛诺神父(Manuel Dias) 出任院长期间，寓舍与学院合并为一个机构，称为天主圣母堂或圣保禄学院。<sup>45</sup>

1601 年，一场大火摧毁了教堂以及四分之三的学院。几天后，一场大台风又使它遭到损失。当时的院长瓦伦丁·卡瓦略(Valentim de Carvalho, 1601-1604)组织了一批居民，修复被毁坏的教堂和学院。在澳门兵头的倡议下，全市提供了与日本贸易额的 0.5% 作为修复教堂的资金(相当于 6,260 法郎)。意大利热那亚耶稣会教士卡罗斯·斯皮纳罗(Carlo Spinola)负责整个工程，他后来在日本殉教。工程非常庞大，宏伟的正面面壁花费了募捐来的 32,000 银币。1603 年，内部装饰工程完成。对于整个城市在此次建设工程中的贡献，教堂一角的一块石头上作了记录，上面刻着：“Vi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t anno 1602”。与教堂相连的学院的大门上在 1604 年建成。正面面壁单独在 1637 年完成，装饰性的雕刻则在 1644 年完成。教堂的主体于 1608 年进行修改，圣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小礼拜堂则到 1689 年才完成。

1835 年 1 月 29 日，一场大火烧毁了圣保禄学院及其附属的教堂，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大部份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阶。当时的《中国丛报》对该次大火作了比较

---

<sup>45</sup>同上，页 44。

详细的报导<sup>46</sup>。自此之后，这里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圣保禄教堂遗址。教堂后部遗址于1837被用作埋葬教士的墓，至1854年为止。

整座教堂用木板和泥浆或称“chunambo”建成，至今还保留着宏伟的麻石正面面壁。正面面壁同时并存着17世纪初欧洲风格主义建筑因素和中国的装饰雕塑因素，特别是采用了中国的“龙头形”滴水嘴。抛开教堂内部的建筑特色，如拉丁十字形平面，有一个凸出的十字形耳堂和三个用木柱分开的侧廊，采用了中国寺庙的建筑手法，这一西方建筑中采用的最显著的中国建筑技术表现在面壁大门的门框上，这儿的门与门框之间都呈45度角，这是一个显著的中国木工技术。在西方的建筑中，门与门框之间都是呈水平布置的。圣保禄教堂的门从外面看，与门框间都呈45度角，而从内部看则表现为西方式的水平平置。这一特殊的细节，即石头被当作木料处理和进行精细的雕刻，照我看来，是圣保禄教堂保留下来的中国影响更为显著的表现之一。

大三巴牌坊的建筑由花岗石建成，宽23米，高25.5米，上下可分为五层，自第三层起往上逐步收分至顶部则是一底边宽为8.5米之三角形山花，整个墙壁是巴洛克式，但一些设计或雕刻，却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如中文或象征日本传统的菊花圆形等图案，这座中西合璧的石壁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堂中是独一无二的。

牌坊第一层，即入口层，此一层共有三个入口并有十枝爱奥尼柱式支撑及装饰墙面，大门两侧各3枝，侧门一边各2枝，小门门楣上有耶稣会简字IHS的浮雕图案，正门上则写有“MATER DEI”，说明此教堂是供奉圣母；第二层相应是第一层之延续，墙壁由十支科林斯柱式及三个窗口组成，窗楣上均有7朵玫瑰花浮雕装饰，中间窗口侧两柱间以棕榄树装饰，侧窗洞两边柱间对称设有壁龛，供奉四个天主教圣人；第三层是装饰最丰富的一层，并开始收分，墙中央设有一深凹之拱形壁龛，供奉着圣母，两侧各有3个天使浮雕，此一层中央共有六枝混合式壁柱，两侧以方尖柱代替壁柱，是下面两层柱体的延续，各柱间均以浅浮雕装饰，左边是智能之树及一只七翼龙，其上有一圣母，侧有中文“圣母踏龙头”字样，而右边对称位置上则是精神之泉及一只西式帆船，上有海星圣母。在柱组外边是一顶呈弧状之扶壁，右边是一骷髅及中文字“念死者无为罪”；左边则是一魔鬼浮雕，中文则是“鬼是诱人为恶”，此层最外侧两块墙身是由两条带有圆顶之方尖柱，而墙侧则设有中国舞狮造型的开大口之狮子，作滴水之用；在第四层是一耶稣圣龛，两侧有耶稣受难之刑具浮雕，往外由四枝混合式壁柱组成，柱间以天使浅浮雕点缀，柱两边有弧形山墙。第五层是一三角形山花，中间有一铜鸽，顶部设有十字架。

<sup>46</sup> 汤开建等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页30-32。

## 五、圣奥斯定教堂(Santo Agostinho Church)

圣奥斯定教堂坐落在圣奥斯定广场，它所在的小山头也是圣若瑟修道院及教堂(Church of Seminar Sao Jose)和圣老楞佐堂(Sao Lourenco Church)的所在地。教堂左边又延伸出了部分建筑物，与广场一起形成了一个角。教堂的正面朝南方偏东南。在《澳门记略》一书中，张汝霖和印光任提到了这个教堂“龙松庙者，在澳西北，初庙就圯，或覆之以蓑，鬣松如髯龙，后庙钟不击自鸣，泉神之，恢崇其制，仍呼为龙松庙。”<sup>47</sup>因此华人多叫该堂为“龙松(嵩)庙”。

早期的奥斯定修道院由两位西班牙修士于1586年建立，这是在1580至1640年间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联合的结果。西葡皇室的联合对葡萄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由此失去了对印度和远东的控制，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转到了荷兰的手中，荷兰是一个刚刚摆脱了西班牙控制不久的新兴国家。西班牙帝国的猛然兴起使它控制的版图几乎翻了一番，同时也使它无法在广阔的版图内实施有效的管治，长久维持既有的局面。

由于澳门当地葡萄牙人有一股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也由于希望向中国政府隐瞒当时葡萄牙的政治格局(否则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3年后即1589年，修道院中的教士被葡萄牙教士替代了。

据记载，教堂的修建者弗兰西斯科·曼内克教士(Friar Francisco Manrique)当初在考虑工程如何建设时，曾为巴尔塔扎·阿南·罗保(Baltazar Arnao Lobo)法官发布的一条有关购买建筑材料的禁令犯愁<sup>48</sup>，禁令要求，修士住所和教堂的修建只能使用木头和草，规格上不能超过长33英尺，宽13英尺。

《澳门记略》书中对于建筑材料的描述与澳门早期建筑中使用材料的一致，使这两位中国官员有关原始建筑重建的描述变得特别有趣和有价值。这座教堂早已在其目前所在的位置，只是“以乱蓬蓬的茅草覆顶，形状就象一条条摆动的龙髯。教堂后面的大钟(显然是指钟楼)无人看管，即自行鸣响。”事实上，据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记述，教堂建成后5年，即1591年，葡萄牙教士佩德罗·桑塔·马利亚(Pedro de Santa Maria)、佩德罗·圣·若瑟(Pedro de Sao Jose)和米格尔·桑托斯(Miguel dos Santos)把教堂迁移到了现在的地方耶稣会圣花地玛(Our Lady of Fatima)的所在地。圣母恩典堂(Nossa Senhora da Graca)也由这些教士修建，而且很凑巧，就在它如今矗立之处。<sup>49</sup>

<sup>47</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150。

<sup>48</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99。

<sup>49</sup>同上。

根据中国官员的记述，圣奥斯定会的教士都剃着光头，戴着毡帽，内着白色法衣，高领，外层衣服为蓝色。<sup>50</sup>

这座教堂和修道院与玫瑰堂(Sao Domingos)一道，卷入了耶稣会教士和其它教派教士之间有关“礼仪”之争的严重冲突中。耶稣会教士反对安条克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卡罗斯·托马斯·马拉德·托农(Carlos T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的追随者。他曾写信给中国的教众，以宗教法庭命令的形式，禁止他们尊崇祖先和儒家规定，而其它东方传教会的教士则支持耶稣会和保持中国风俗仪式。由于奥斯定和多名我会教士都支持托农，澳门主教若奥·卡萨尔(D. Joao do Casal)于1707年下令关闭了圣奥斯定堂和玫瑰堂。

这一系列冲突发生之后，1712年圣奥斯定堂的管辖权被转到了教区长的手下，此前，根据印度总督的命令，住持教士已被驱逐、逮捕，并被转移到了印度的果阿。<sup>51</sup>

后来，到了1721年，遵照唐·若奥五世(D. Joao V)的御诏，圣奥斯定堂又回到了奥斯定教派教士的手中。同一年，印度总督又下令澳门市议会，对奥斯定教派教士处理圣奥斯定修道院或教堂的事务提供一切帮助。

19世纪，即1874年和1887年，圣母恩典堂(Nossa Senhora da Graca)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事实上，所有现存室内的灰泥粉饰、祭坛、唱诗队的高台以及中殿的天花板都是19世纪最后25年内完成的。现存的钟楼显然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建成的，这座钟楼的位置与原先的那座刚好相对，在主小教堂的西南面，也许就在旧法衣室的上面，遵循了与圣玫瑰教堂和修道院相同的空间布置方式。由于主小教堂和法衣室在1874年倒塌，第一次全面修复工作便得以进行<sup>52</sup>，这次修复工作使得教堂的结构安排和空间布置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仿照玫瑰堂的先例，修道院修在教堂的右边，那儿此前是耶稣会教士的住所。

自1834年传教活动消失以后，修道院便成了军队医院，直到1874年圣·亚努阿里奥伯爵(Conde de Sao Januario)医院，即山顶医院建成。此后，它便成了军队的营房，直到1893年成立了澳门大会堂。1894年4月，经过重新修复，圣奥斯定修道院归于受人尊敬的修道院院长的管理之下<sup>53</sup>。

这座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教堂，是葡萄牙装饰手法主义的建筑，遗留下来的所有踪迹无疑只剩下这个大理石的门洞了，门洞两边有两对由整块巨石雕成的柱

<sup>50</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151。

<sup>51</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页84。

<sup>52</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页74。

<sup>53</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年，页273。

子，顶上是托斯卡纳式的柱头，支撑着门上的过梁。除了石门洞外，正面门楼涂抹得浓彩重墨，具有巴洛克殖民遗风，却又不断掺杂着两维的图画，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空间，它又反映了 19 世纪最后 25 年的深刻影响。教堂东侧的墙面相当于现在的法衣室的地方，通往唱诗队的高台和圣耶稣受难兄弟会聚会室之路也进行了粉刷装饰，但其构架和装饰的简洁节制的特点反映了澳门殖民新古典的风格。

新钟楼的顶上有新哥特式的雉堞状凹处，体现了一种在澳门开始出现的折衷特色，这种后来以不同形式频繁出现在澳门的其它建筑物中，而且常常达到了一种离奇的效果。

目前圣奥斯定教堂建筑由主堂、祭坛区及服务区组成，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祭坛区长 20.5 米，宽 11 米。具有浓厚巴洛克色彩的主祭坛紧靠后墙身。其平面呈弧线状，中间为内凹之壁龛，两侧分别以方形及圆形壁柱装饰。其中靠近壁龛的两枝方形壁柱之柱顶更以破山花形式出现。主堂长 30 米，宽 13.5 米，平面由两排科林斯柱划分为三道纵向空间。各柱间以砖拱相连和墙身共同支撑着中式坡屋顶，瓦顶下又设有带彩绘的木制假天花。两边墙身设有小壁龛，墙身上部则开有落地大窗，主要起空气对流作用，是一般教堂中少见的做法。教堂唱诗台位于入口处上方，深 6 米，并向两沿边墙延续，而成为一窄长之露台，露台在落地大窗位置突出成半圆形平面，底部有别具特色的花饰衬托。这种露台设计，主要是考虑到两侧大窗需经常关闭以调节室内气温。

教堂正面设计古朴简洁，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影子，两边有凸出之方形壁柱，中间开有入口大门其两侧各为一对古希腊式柱式，上有相同材料之门楣。主面中部开有三个落地大窗，中间一个占据全层高度，所有窗户周边均有简单白色浅浮雕装饰。立面最上部份是一山花，山花自立面两侧壁柱顶起收分成三角形状，中间设有一壁龛，供放着圣母像，教堂之服务区建筑为两层高建筑，装饰甚少，圣奥斯定堂整体主要刷以黄色，并以白色油漆饰线及浮雕装饰，形象较为朴实。

## 六、玫瑰堂(Sao Domingos Church)

玫瑰堂坐落在圣多明我广场，位于议事亭前地的东北，正门朝向为南偏东南。

1587 年—1588 年间西班牙多明我教派传教士安东尼奥·阿瑟迪亚诺(Antonio de Arcediano)、阿隆索·德尔加多(Alonso Delgado)和巴托洛梅乌·洛佩斯(Bartolomeu Lopes)从菲律宾乘船来到澳门，在曾属于教区膳食供应人的一间房子内设立了圣母玫瑰(Nossa Senhora do Rosario)之屋。同一天，建造了供奉圣母玫瑰的第一座小教堂。

这座小教堂完全由板樟木建成，所以，教堂的中文名字至今仍然是“板樟堂”。过后不久，根据印度总督唐·杜阿尔特·德梅内泽斯(D. Duarte de Menezes)的命令，西班牙传教士被勒令于 1588 年 3 月离开了澳门。修道院和小教堂便落入了葡萄牙多明我教士的掌管之下。<sup>54</sup>

现存教堂修建的具体日期，没有文献资料记载，但从其建筑结构(以中国青砖砌成一米厚的墙壁)来分析估计，它大致应该建于 1738 年大台风过后的 1739 年，“水位的高度在玫瑰堂的正面墙壁上留下了印记”<sup>55</sup>，果阿主教 1739 年在描述澳门各教堂损坏情况时，有关玫瑰堂的文字中如此说道。然而，很可能在第一座木头教堂和 18 世纪建成的教堂之间，还有一座 17 世纪建成的宏伟的“石头”教堂，墙壁可能是用板条和灰浆建成的，现存的教堂在风格和规模上都是其自然的继承。

上文多次引用过的《澳门记略》一书在提到这座教堂时有下面一段文字：“有板樟庙，相传庙故痹隘，贫蕃析樟板为之，今壮丽特甚。”<sup>56</sup> 考虑到这一描述是 1746 年作出的，我们不知道它指的是否是最初的教堂，该教堂与澳门的其它教堂一样，最初也是用木头建成的，或者它指的是 1738 年前的教堂，因为文中提到了“现在其规模已颇为壮观”。

我们知道，到 1704 年，教堂建了一个“高坛”。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高的高坛，对于象圣玫瑰堂这样有附设的修道会的教堂，它常常可以用作去那儿的直接信道。从“高坛”存在的情况来看，18 世纪初建成的教堂也很可能是用木板和泥灰建造的，至少在建造主体墙的时候，使用了木材、板条和泥灰混合而成的建筑材料，这是葡萄牙人在巴西常用的建筑材料，在那儿，人们称其为“pau a pique”(直译意为：挺直木头)。

除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这个教堂里交叉进行的重大斗争外，这座教堂和修道院还贯穿着一系列值得特别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具有显着的特殊性，而且在澳门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见证了该地区所经历的伟大或丑恶的时刻所发生的一切。

圣玫瑰堂与圣奥斯定修道院一样，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礼仪之争”，按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e XI)批准的宗教裁判所颁发的命令，中国天主教徒的祭祖仪式是受到禁止的，这最终导致了耶稣会的消亡，并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构成了严重的打击。

---

<sup>54</sup> M. Manuel Teixeira, 《IV Centenario dos Dominicanos em Macau 1587-1987》, Fundacao Macau, 1987, p.5-7.

<sup>55</sup>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 年，页 126。

<sup>56</sup> 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 年，页 150。

1874年的一天，“大约下午4点30分左右，雷电击中了圣玫瑰堂的钟楼，使主教堂失火。到晚上10点30分火灾最终得到控制时，已只烧得剩下教堂的围墙了。雷电过后，暴雨接踵而至，整个城区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最后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sup>57</sup>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6小时的大火和绵延的暴雨之后，整座教堂已只剩下了一片废墟。之后进行了重建，留下了现存的内部拉毛粉饰以及刻有19世纪葡萄牙殖民语言的通气式花饰天花板。

整座教堂由一座中殿和两座耳堂组成，其间以方柱隔开，这些柱子也是由大砖建成的，支撑着科林蒂亚式的灰泥柱头上的圆拱门。

教堂的东边仍然保存了原来与其相连的旧修道院的部分残迹，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由公务司司长阿布雷乌·努内斯(Abreu Nunes) 工程师对圣多明我街区进行了彻底的维修。<sup>58</sup>

玫瑰堂为一砖结构建筑，教堂主要由主堂、祭坛区及一座三层高之钟楼组成。祭坛区深18米，宽12.2米，设有巴洛克特色的主祭坛。其处理手法与圣奥斯定教堂相同，但其壁柱却以盘旋形式出现。主堂呈长方形，长32米，宽15米，由两列各5个券柱式划分为三道空间。柱子边长为0.9米，为科林斯柱式，各柱以砖拱相连，支撑着中式坡屋顶。屋脊高17米，檐口高13.5米，搭接在两边侧墙上，主堂室内设有木制假天花，天花漆成蓝色，间中设有镂空木条作通风之用，主堂墙身上共有四个小圣龕，两个在两侧墙上，其余两个在分隔祭坛区和主堂的墙体上。两侧墙身上开有10个长方形落地大窗，窗户兼有窗楣，下层共开有9个门口，其中5个门口直接与侧廊相连，主堂侧廊位于右边，宽3米，高4.5米，其外墙被4个拱形大窗完全占据。侧廊之平屋顶是通向唱诗台之主要信道。唱诗台设于入口区之上方，深度为7.5米，由两边墙体及两条立柱承托，并沿两边墙与延伸，成一窄长露台，以便于关闭两侧墙身上之窗户。在祭坛右侧，侧廊之尽头，是三层高之钟楼，一楼主要为教堂服务区，二、三楼是展览厅，陈列着自16世纪以来澳门珍贵的天主教文物和艺术品。钟楼尚保存着其原来的木楼板结构及屋顶木结构。在三楼墙洞里，装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铜钟。

教堂正立面上下分为四部份，左右分为三部份。高达20米的三角形山花在中央占主导地位；其下之墙身以一内凹椭圆形宗教徽号浅浮雕装饰，两侧有科林斯圆柱及弧形扶壁。立面最下两部份则是室内空间的反映，其左右三部份空间主要由8支圆形壁柱界定，其中第二层壁柱主要为科林斯式，两侧壁柱顶又设有葫芦形短柱装饰。组

<sup>57</sup>施白蒂：《Cronologia da Historia de Macau》，卷三，澳门教育及青年司出版，1993，p.244。

<sup>58</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 1979, p.103。

柱间共开有三个大窗，两边稍小且有半圆形窗楣，中间大窗则以灰泥浮雕代替窗楣。下层设有三个入口大门，均以灰泥浮雕作门楣，其柱式为爱奥尼式，柱基不作粉刷暴露其花岗石材质，在整个黄白色立面中起视觉稳定作用。教堂墙主要是黄色，各装饰线则粉刷成白色，门窗一般为绿色，精致的灰泥浮雕大量地使用于室内外，尤其是正立面上那些精美的图案，配以比例合宜的壁柱，令教堂显得格外高雅华丽。

## 七、大堂(Cathedral Church)

大教堂坐落在大教堂广场上，位于西望洋山、妈阁山余脉和圣奥斯定堂及大教堂山相夹而成的山岬中，有龙嵩街与其相连，往前延伸，名称依次变化为妈阁街(Barra Street)、高楼街(Padre Antonio Street)、风顺堂街(S. Lourenco Street)、龙嵩街(Central Street)及大堂街(Se Street)。随着新马路(Almeida Ribeiro Avenue)的建成，这条街就被切断了，大堂所在的小山与其它山被隔断了。因此，大堂街与新马路就只能通过一段台阶相连。《澳门记略》记：“大庙者，夷人始至澳所建也，在澳东南。”<sup>59</sup> 因此华人多称之为“大庙”。

这是澳门唯一一座面朝北方的教堂，更准确地说，是面朝北偏西北方。

澳门第一座大教堂所在的位置至今还是个谜，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第一座大教堂就是圣母希望修道院，也就是望德堂。

大堂重建于1622至1623年间<sup>60</sup>，之前是一简陋的小教堂。1780年又进行了重修。现今所见的教堂重建于1844年至1850年，时任澳门主教的是唐·尼古劳·佩雷拉·博雅(D. Nicolau Pereira de Borja)，他的继任者是唐·热罗尼莫·马塔(D. Jeronimo da Mata)，后者于1850年2月19日对教堂进行了祝圣，教堂的设计工作是由托马斯·阿基诺(Tomas de Aquino)完成的，对此，教堂西南墙面有碑文铭记。

1874年该教堂又进行了重大的维修，倡议人是公务司司长弗兰西斯科·热罗尼莫·鲁纳(Francisco Jeronimo Luna)。至少从1862年起，该教堂的朽坏情况就很严重了。

现存教堂是1962年重修的结果，其原来的风格受到很大的影响。

## 八、圣若瑟修道院教堂(S. Jose Seminar Church)

圣若瑟修道院教堂位于紧靠圣老楞佐教堂的北边，大门开在三巴仔街(Rua de Seminario)上，面朝东南方。《澳门记略》记：“澳西有小三巴寺，规制差约而轩豁过

<sup>59</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150。

<sup>60</sup>文德泉神父：《Toponimia de Macau》，卷一，澳门，Imprensa Nacional，1979，p.109。



之，三巴之外库也。”<sup>61</sup> 因为与大三巴同为耶稣会所创建作为培养东方传教士的学院，而且又建于大三巴之后，故华人多称之为“三巴仔”。

这座外形象希腊式十字架、倾向于巴罗克风格的教堂在东方极为罕见，同样风格的只有旧果阿城的圣康塔诺(S.Caetano)教堂。

教堂矗立在一座宽大的大理石石阶上，进口的大门不大但很精制。出口的结构类似于圣保禄教堂，后者也是一座耶稣会教堂，同样矗立在一座大理石石阶上。教堂位置显著，正面面壁的结构也很独特，尽管 1953 年在澳门主教唐·若奥·得乌斯·拉马略(D. Joao de Deus Ramalho)的命令下，教堂外层材料有了些变化。

教堂的建造工程于 1746 年开工，安放下了第一块石头，1758 年建成，附属于修道院。圣若瑟教堂大门的右边，有一块石头，用拉丁文镌刻着以下文字：“本教堂献给圣约瑟，它的第一块石头于公元 1746 年由耶稣会修士放置，教堂建成于 1758 年。”<sup>62</sup>

1759 年，庞巴尔侯爵(Marquis Pombal)解散了葡萄牙的耶稣会。1762 年，澳门的耶稣会教士也被逮捕，并于 1767 年被驱逐出了澳门，此事对在澳门和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63</sup>

面对这种情况，1783 年后，遣使会教士取代耶稣会教士，成为北京的主要传教士，1797 年的一封皇家信函肯定了这种情况，并把北京的圣约瑟教堂授给了遣使会教士。也是在同一年，旧圣若瑟学院变成了一座修道院。<sup>64</sup>

由于教堂穹顶和支撑拱门朽坏得很厉害，需要马上加固，1995 年，教堂不得不向游人关闭。穹顶马上就被支撑住了，修复和加固工程也马上开工。工程于 1999 年年初开工，工程包括用一个虽然较轻但与其相似的穹顶代替原来的穹顶，加固基础，内部木器和粉饰进行修理，内部电器和照明用具更新，祭坛重建，塑像重新布置，把它们放置到恰当的位置，把所谓的“水刷石”(Shanghai-plaster) 恢复成原来的灰泥饰面，该工程在 1999 年内完成。

## 第二节 庙宇建筑

### 一、妈阁庙

妈阁庙位于澳门半岛西端，依山而建，背山面海，是一座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sup>61</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 年，页 150。

<sup>62</sup> Maria Regina Valente：《澳门教堂》，澳门文化司署，1993 年，页 82。

<sup>63</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 年，页 156-161。

<sup>64</sup>同上，页 179。

古建筑。妈阁庙主要由入口大门、牌坊、正殿、弘仁殿、观音殿及正觉禅林组成，各建筑规模虽然细小简陋，但却能充分融合自然，布局错落有致。

妈阁庙包括“神山第一”殿、正觉禅林、弘仁殿、观音阁等建筑物。明朝时本名“天妃庙（宫）”，至清道光八年（1828）重修时增建山门，额名“妈祖阁”，华人俗称“妈祖阁”，又有另称“正觉禅林”。

妈阁庙之建筑物建于不同时期，整座妈阁庙至清道光八年（1828）才初具规模。现在庙内有实物可考，而历史最长的是“神山第一”殿。该殿供奉天后，由当时官方与商户合资筹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sup>65</sup>，至明崇祯二年（1629）又再重修，其门口石横梁至今仍存初建时的石刻；妈阁庙之“神山第一”殿因而是澳门现存庙宇中有明确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也是澳门文物中原建筑物保存至今时间最长的。

弘仁殿相传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现存门楣石刻“弘仁殿”三字，旁边之题款则为清道光八年（1828）。该殿是一座小型石殿，供奉天后。

观音阁的建筑年代无从稽考，阁内现存一块清道光八年（1828）重修的木匾，则观音阁应建于此前，阁内供奉观音<sup>66</sup>。

正觉禅林也是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供奉天后。此殿在1988年2月8日曾发生火警，后由文化局按原貌重修，至翌年2月完成。

1874年、1875年，妈阁庙先后两次遭受火灾，造成损毁，于是由居民集资，于清光绪元年（1875）开始重修，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落成，形成今天的样子。

除了于1983及1988年给予资助维修该庙外，文化局于1996-97年间对该庙进行保养工程，包括墙壁、装饰墙身及门窗的框架等。

## 二、普济禅院

普济禅院位于美副将大马路，是澳门三大古刹之一，也是澳门地区最大的一间寺庙。其前身本名观音堂，由望厦村村民所建，因供奉观音菩萨而名，至今华人仍称之为“观音堂”。现存铁钟铭文记：“钟壹口重四百余斤，奉于观音堂永远供奉，祈求诸事胜意。崇祯五年正月吉日立。”从实物考证分析，观音堂应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普济禅院创建的时间应在1689-1692年间，由大汕和尚的长寿寺派人及出资，而具体是由其徒孙循智创建和兼并原观音堂而发展起来的民间禅院<sup>67</sup>。

<sup>65</sup>谭世宝：〈澳门三大古禅院之历史源流新探〉载于《文化杂志》第42期，澳门文化局，2002年。

<sup>66</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其中史料〈澳门妈祖阁历史告澳人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sup>67</sup>谭世宝：〈澳门三大古禅院之历史源流新探〉载于《文化杂志》第42期，澳门文化局，2002年。

用夯土建造的，建在圣奥斯定会早年会所原址，即今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官邸(前峰景酒店)东边。

#### 四、东望洋炮台

东望洋炮台位于澳门半岛最高点 94 米的东望洋山顶，1848 年前是唯一一座在城墙以外的炮台。东望洋炮台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建成；炮台内的灯塔则创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次年 9 月 24 日正式启用，是中国以至远东地区最古老的灯塔。东望洋灯塔是澳门著名的城市标志，也是澳门的地标；灯塔所处的经纬度(东经 113° 35"，北纬 21° 11")，即为澳门的地理坐标。

#### 五、圣方济各堡垒

圣方济各堡垒又称嘉思栏炮台，位于南湾大马路之始点，是防御外来攻击的第一道防线。该炮台因邻近旧圣方济各修院，因此称为圣方济各炮台，其锥型大约建于 1623 年<sup>75</sup>，其炮火射程最远能达凼仔岛鸡颈山的尽头，是当时澳门东南方向海防重地。炮台石墙高逾 2 丈，宽 20 余丈，原呈椭圆形；分上下两层，有隧道可通下层，现下层炮垒，已被填海工程湮没。炮台后的二层楼房即为嘉思栏兵营。

#### 六、其它炮台

澳门半岛的炮台还有：清同治五年（1866）建成的望厦炮台、清咸丰二年（1852）建成的马交石炮台。这都是 1848 年葡萄牙实行在澳门的殖民管治，拆毁原天主教城的城墙，占领城外华人村落至现关闸后建造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从大陆来的攻击。

### 第四节 民居建筑

澳门的社会有西方人定居和华人移居的特殊环境。早期的建筑无论是华人还是葡人的房子都较简陋，基本上按照家乡的建筑形式和建造方法。随着建造行业的兴旺，建屋的工匠队伍有一定的规模，建造的技术混合了传统的中式尺量法和西化造型的手法，材料的使用，有华人喜好的砖木，陶瓷，也有葡人常用的石条，土坯，金属构件等，一般华人的住宅在室内依然保持传统的平面布局和装饰，室外门窗，入口，阳台等则多采用西方的建筑手法，建筑风格上别具特色。

---

<sup>75</sup>同上，頁 73。

#### 四、其它庙宇

澳门的其它庙宇还有：沙梨头土地庙、观音古庙、康公庙、包公庙、莲溪新庙、鲁班师傅庙、马交石天后庙、关帝庙、哪吒庙(柿山)、下环福德祠、石敢当行台、先锋庙，这些庙宇大部份都是建于1800年至1900年期间，见证着中葡两国对澳门有效管治的转变。

### 第三节 炮台建筑

#### 一、大炮台

大炮台又称三巴炮台、中央炮台、圣保禄炮台，位于高52米的大炮台山顶。大炮台的位置原来是圣保禄学院的祀天祭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起由耶稣会会士改建为炮台，明天启六年（1626）建成<sup>72</sup>，名为圣保禄炮台，澳门居民多称为“大炮台”。

这座炮台是当时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构成一个覆盖东西海岸的宽大炮火防卫网；设置多门大炮，并备有水池及军需库；当年的军需库储备充足，即使遭受长达二年的包围，也足以应付。大炮台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呈正方形，围有坚厚石墙，仿如欧洲古堡。城墙用夯土（一种泥土、草和牡蛎壳粉三者混合的材料）垒建。

#### 二、圣地亚哥炮台

圣地亚哥炮台又称西湾炮台、妈阁炮台，位于澳门半岛南端靠妈阁山的海边。炮台于明崇祯二年（1629）建成，由于地处内港狭窄入口处，可以控制所有海上活动，是当时澳门一座重要的炮台<sup>73</sup>。旧炮台留下的城墙现还有大约110米长，9米高，底部有5.9米宽，顶部有3.4米宽。城墙是用夯土（chunambo）造的，混进一些石块，但比大炮台的质量要差一些。

#### 三、烧灰炉炮台

烧灰炉炮台又称圣母炮台，位于西望洋山东南麓的南湾地段，负责防御从外港来的攻击。据记载，炮台在明天启二年（1622）击退荷兰人入侵时即已存在<sup>74</sup>，也是

<sup>72</sup> Jorge Graca, 《Fortificacoes de Macau---Concepcao e Histori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p.47.

<sup>73</sup>同上，頁61。

<sup>74</sup>同上，頁69。

用夯土建造的，建在圣奥斯定会早年会所原址，即今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官邸(前峰景酒店)东边。

#### 四、东望洋炮台

东望洋炮台位于澳门半岛最高点 94 米的东望洋山顶，1848 年前是唯一一座在城墙以外的炮台。东望洋炮台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建成；炮台内的灯塔则创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次年 9 月 24 日正式启用，是中国以至远东地区最古老的灯塔。东望洋灯塔是澳门著名的城市标志，也是澳门的地标；灯塔所处的经纬度(东经 113° 35"，北纬 21° 11")，即为澳门的地理坐标。

#### 五、圣方济各堡垒

圣方济各堡垒又称嘉思栏炮台，位于南湾大马路之始点，是防御外来攻击的第一道防线。该炮台因邻近旧圣方济各修院，因此称为圣方济各炮台，其雏型大约建于 1623 年<sup>75</sup>，其炮火射程最远能达凼仔岛鸡颈山的尽头，是当时澳门东南方向海防重地。炮台石墙高逾 2 丈，宽 20 余丈，原呈椭圆形；分上下两层，有隧道可通下层，现下层炮垒，已被填海工程湮没。炮台后的二层楼房即为嘉思栏兵营。

#### 六、其它炮台

澳门半岛的炮台还有：清同治五年（1866）建成的望厦炮台、清咸丰二年（1852）建成的马交石炮台。这都是 1848 年葡萄牙实行在澳门的殖民管治，拆毁原天主教城的城墙，占领城外华人村落至现关闸后建造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从大陆来的攻击。

### 第四节 民居建筑

澳门的社会有西方人定居和华人移居的特殊环境。早期的建筑无论是华人还是葡人的房子都较简陋，基本上按照家乡的建筑形式和建造方法。随着建造行业的兴旺，建屋的工匠队伍有一定的规模，建造的技术混合了传统的中式尺量法和西化造型的手法，材料的使用，有华人喜好的砖木，陶瓷，也有葡人常用的石条，土坯，金属构件等，一般华人的住宅在室内依然保持传统的平面布局和装饰，室外门窗，入口，阳台等则多采用西方的建筑手法，建筑风格上别具特色。

---

<sup>75</sup>同上，頁 73。

澳门民居的类型因所在区域的性质，户主和年份的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别：

### 一、大型中式民居

华人的大宅现存数量不多，建筑平面布局与广东地区的城镇或村落相似。民居一般是多层楼房，平面三开间，其中有三间两廊式，四合院式或是组合式，屋内有天井，屋旁有庭院或花园。目前最大的民居建筑群是郑家大屋，其它保存较好民居有大堂街7号卢宅和水坑尾29号高宅，园林式建筑组群的卢廉若花园大宅。

### 二、小型中式民居

受到政局影响，廿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量的人口从内地迁移入澳。澳门的人口数量急速上升，由二十年代前的7-8万增至1940年的40万，导致澳门的土地价值顿时提高，居住的密度和居住单元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民居一般为两层半或以上，平面布局多为竹筒式。

竹筒式住宅因地形和用途分成几种类型，其中有：

一 独栋式住宅带西式立面；

一 并联式住宅带中式或西式立面；

一 集居式住宅如联排式住宅带西式或中式立面，分布在里巷间；

一 其它类型民宅，有些受西方建筑学影响，根据功能需求而灵活布局，平面紧凑，一宅多单元。

竹筒式住宅虽然面积小，室内空间简单，但是建筑外装饰丰富美观，相信与当年建造工匠的工艺水平和一般民众的审美标准有关。

### 三、一般商住民居

典型的商住建筑分布在华人集居的内港湾岸上，建筑类型是联排式竹筒型铺屋。沿大街首层铺位外有骑楼，楼上住房有单开间或打通隔洋使用两开间，布置灵活，符合商品房要求，实用性强<sup>76</sup>。

### 第三章 从澳门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融

#### 第一节 天主教城的形成与发展

嘉靖三十三年(1554), 葡萄牙日本船队指挥官索萨 (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后, 广东地方官员允许葡萄牙进入广州进行合法的定期的贸易, 为后来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居留地提供了基础。据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海市〉记载:“岁甲寅 (1554 年), 佛郎机夷船来泊广东海上, 比有周鸾号称客纲, 乃与番夷冒他国名, 诳报海道, 照例抽分, 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周鸾每以小舟诱引番夷, 同装番货, 市于广东城下, 亦尝入城贸易。”说明所谓的“协议”并没有涉及开放澳门作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至于澳门的建立, 王士性记载当时情况较清楚:“其(夷商)初上舟居, 以货久不脱, 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 诸番遂渐效之。”<sup>77</sup>由于需要保持与广东当局的定期贸易, 葡萄牙人必须在广州港的外海有一个临时的居留地, 初则在浪白澳, 后因当地风高浪恶, 因此逐渐地迁移至澳门。1557 年前聚居在浪白澳的葡萄牙人, 逐渐移居澳门, 当年的人口已达 400 名天主教徒。<sup>78</sup>当然从一开始, 澳门居民的构成不仅有葡萄牙人, 而且主要是从世界各地跟随葡萄牙人远洋航行而来的印度人、非洲人、暹罗人、马来人和日本人等。

澳门城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临时的居留地, 或者说是基于以贸易为主导的一个商业点, 并不具备一个城市的雏型。大部份的临时建筑都分布在海边和山坡上, 最早的建筑都是用简单的材料, 如木板和稻草建造, 因此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建筑的痕迹。随着从事日本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不断发展, 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商业往来越来越频繁, 当然也包括与中国海上商人的贸易活动。庞大的商业利润使澳门逐渐发展成在广州以外的重要商业港口。在这个居留地上的外国商人开始从中国商人的手里购进木材、砖瓦等耐用的建筑材料来建造固定的建筑物, 这引起了中国方面的疑恐, 正如《澳门记略》所言:“初仅茆舍, 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瓦甍榱桷为屋, 佛郎机遂得混入, 高栋飞甍, 栉比相望, 久之遂专为所据。”<sup>79</sup>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各自看中的地方建造自己的仓库和房屋, 当时还没有任何官方的机构去管理土地, 当然也没有土地的买

<sup>76</sup> 引自蔡田田、陈泽成:《澳门民居》, 2001年。

<sup>77</sup> 转引自汤开建:〈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载于《文化杂志》第35期, 澳门文化局, 1998年。

<sup>78</sup> 转引自(德)普塔克:〈澳门历史概述〉载于《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 澳门基金会, 1995年。

<sup>79</sup> 印光任、张汝霖著, 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 1992年, 页65。

卖。

随着大量的天主教徒聚居在澳门，为了向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需要，在1560年之前，在澳门半岛已经建立了三个简陋的教堂：圣安多尼教堂、圣老楞佐教堂和圣母望德教堂。这些教堂都是隶属于印度果亚教区，并没有肩负传教的功能。由于大部份的教堂都是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因此开始了澳门有规划的城市布局。教堂的前地有助于居民点的布局，葡萄牙人墨守成规这一传统特点也表现在自发地进行城市建设方面，他们在澳门重新采用了在印度和其它亚洲商站相同的做法。

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抵达并定居澳门是在1563年7月29日，在此之前的1561年，耶稣会传教士曾赴日本传教途经澳门。为了向远赴日本传教的传教士提供服务，为了使在澳门等待中国官方的批准而进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有寓居之所，澳门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小礼拜堂和寓所。

随着耶稣会活动的发展，在1575至1579年间建立一个更大的教堂和寓所。1580年范礼安神父在寓所后建立了一个学习中心，专门安排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后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进入中国传教前就是在这中心学习）。<sup>80</sup>1576年1月23日通过“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敕书，教皇格雷戈利奥十三世（Gregorio XIII）成立澳门教区，其辖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所有毗邻岛屿，并任命唐·贝尔希奥·贾尼路（D. Belchior Carneiro）为署理主教。<sup>81</sup>1594年耶稣会学院成立，课程包括阅读与书写、文法、人文学、伦理神学，后期还有艺术和中国文化、拉丁、数学、音乐等。学生有当地的居民和来自日本和果亚的耶稣会会员<sup>82</sup>。耶稣会学院即圣保禄学院是澳门第一个教育机构，为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提供坚实的基础。该学院一直发展至相当于大学的水平，并拥有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印刷厂，直至1835年大火烧毁为止，它一直是东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学院。

1580年至162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期间，更多其它的传教会陆续到达澳门，包括圣奥斯定修会、圣多明尼修会、圣方济各修会等，他们都在澳门建立起教堂和修道院。使澳门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天主教传教基地，被誉为“东方的梵蒂冈”。

随着教堂数量的增加，和居住人口的增长，在教堂周围建立的居民点越来越大。1574年明朝政府在连接澳门半岛的狭长莲茎上建立了关闸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葡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澳门半岛南部的活动，同时也限制内地居民和商人进出澳门。在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7《方略》中记载：“明万历二年设关闸，委官守之，每

<sup>80</sup>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Westview Press, 1996, p.71.

<sup>81</sup>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澳门基金会, 1995年, 页18.

<sup>82</sup> Domingos dos Santos: 《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 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 1994年, 页45.



逢一、六开关，岁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启闭。广肇南韶道发封条六道，文武官会同验放，事已闭关，复就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栅，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籍。”<sup>83</sup>可见，明政府在设立关闸楼的同时，也在澳门的中心划定街道和门籍，以方便对在澳夷商的管理。因此可以证明这一条“中贯四维”的十字大街是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

到了16世纪80年代，由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u Ricci)的努力，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事业。利玛窦先后在中国内地的肇庆、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设立教堂，吸收大批中国教徒入教，而他的全部传教工作都是以澳门为基地进行的。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澳门，寓居在天主圣母堂寓舍，在圣保禄学院前身的学习中心学习中文，研究适合中国的传教方法，作为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种种准备工作。由于澳门教区直接管辖中国的传教工作，加上在澳门的各个传教会的目的都是为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因此，澳门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后勤基地，当传教活动遇到挫折的时候，澳门又成为这些传教士的庇护所。

随着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和发展，到了清朝初年，杨光先在《请诛邪教状》中说，有30所大教堂遍布于全国大中城市，全国天主教徒达15万人左右<sup>84</sup>。但是作为传教基地的澳门只有不足7000名华人天主教徒<sup>85</sup>，而且只有一个教堂为华人教徒服务，就是由圣保禄教堂教士负责管理，并用汉语传教的“唐人庙”。乾隆十年(1746)，澳门同知张汝霖详细报告了中国人在澳门唐人庙入教的情况：“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二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sup>86</sup>

由此可见，在澳的天主教区为了表示对地方官员的恭顺，特别设一唐人庙为华人教徒服务，其它教堂只向葡萄牙人和其它外国人教徒服务。另一方面，当中国当局禁止华人进教时，也可以避免殃及其它教堂。

葡萄牙人在亚洲扩张和建立居留地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炮台和其它防御设施，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其商船和居留地免受敌人的攻击。但是直至1600年以前，澳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炮台，虽然澳门已经从一个临时的居留地逐渐转变成固定的居留地，居留地

<sup>83</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11。

<sup>84</sup> 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528。

<sup>85</sup> 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页189。

<sup>86</sup> 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81-82。

的防卫主要由船队的火炮、简陋的岸边堡垒和一些安置在战略要点的火炮来负责。随着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葡萄牙人为了保护这个居留地的财富，防御来自海盗的抢掠和新崛起的其它西方列强的威胁。开始在澳门半岛建造炮台，在南湾的北端建立了圣方济各炮台、南端有烧灰炉炮台和在澳门半岛最高点建立的东望洋炮台，负责防御来自外海的攻击；在半岛最南端的有圣地亚哥炮台，作为扼守内港入口的最具战略性的防御设施；和位于市中心的山丘上建立的大炮台，组成了这个城市最坚固的防御系统。同时葡萄牙人也尝试建造城墙，划定他们的保护范围。

葡萄牙人在建造炮台和城墙的过程中，一直都受到中国当局的反对而拆毁。在1604年由于受到来自荷兰船队的威胁，荷兰人对澳门的一系列袭击在1604、1607、1622和1627年多次发生以后，中国地方当局默许了葡萄牙人建造炮台和城墙的要求。1623年5月6日印度总督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下令，任命王室贵族唐·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为澳门第一任总督兼兵头<sup>87</sup>。他到达澳门后，就开始筑城墙。但是中国官方只允许建筑面海及向西的城墙，以防备其它夷人的进犯；面对大陆的部份是不准筑城的，已造好的也得拆除。随着明皇朝的衰落，明政府曾要求在澳葡人组成火炮队协助抵抗满洲人的入侵，造成了葡人以修筑炮台和城墙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从1622年至1648年间在澳葡人修建了坚固的炮台和城墙，从而在地理上也划定了葡萄牙人天主教城的范围。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葡人兴建的城墙和官方在莲茎上设置的关闸楼，使中国地方当局可以更有效地孤立和管治城里的外国居民，防止他们进入中国内地。

天主教城内公共建筑的兴建还是由教会来主导，1576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澳门主教的唐·卡内罗(D. Belchior Carneiro)于1568年到达澳门后，就创办了澳门第一个慈善机构---仁慈堂和穷人医院---圣拉匝禄医院(S. Rafael Hospital)。澳门仁慈堂是面向穷人和病人的慈善机构，主要服务于澳门的葡籍社区，这也说明一个事实，今天老区的很多物业都属于他们。

在澳门这个主要从事海上贸易的城市，成年男子经常是每年有六至八个月在海上，容易遇到海难和海盗。因此常常会丢下孤儿寡母穷困潦倒，只有靠仁慈堂收容照顾他们。这个慈善机构在澳门居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她通过募捐和遗产捐赠等办法筹集资金以照顾城里的居民。

1586年澳门取得了城市的地位，成为中国澳门上帝圣名之城，由1583年成立的市议会负责市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市议会也负责与中国地方当局在民事、商

---

<sup>87</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页36。

务和管治的协调工作。

踏入十七世纪，天主教城得到很大的发展，大部份教堂得以新建或重建。新建的教堂和修道院包括西班牙修女们兴建的圣嘉辣修道院和为华人新教徒修建的安帕罗圣母教堂等。重建的有圣保禄教堂、圣安多尼教堂、圣老楞佐教堂等。但在1641年荷兰人占领了马六甲，中断了澳门---马六甲---果亚的贸易航线，同时日本方面也驱逐葡萄牙商人，使澳门急速地走向衰退。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不转向帝汶的小巽他群岛、苏禄、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印度支那和暹罗等地，在那里开辟新市场，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失去日本贸易的损失。众多市场的开辟，使葡萄牙人得以摆脱困境，继续维持在澳门的商业地位<sup>88</sup>。与此同时其它富裕的欧洲天主教徒也开始进入澳门并成为当地的居民。

十八世纪随着广州港向外商重开，和每年一次的定期交易，澳门作为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的优势中断，澳门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州交易会期间，外国的贸易公司都在沙面设立货仓和洋行，由于清政府规定外商及其家属都不能在广州居留，故澳门就成为众多欧洲公司和美洲公司设立总部的城市，也就是他们进入广州贸易的中转站。在城市建筑方面，很多源自欧洲的建筑风格就在这个时候被引入澳门，这主要表现在南湾一带的商行、住宅和政府建筑上。在宗教建筑方面，1746年奠基，1758完成的圣若瑟修道院教堂，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在这教堂的建筑上得到充份地表现。

十九世纪由于鸦片贸易的利润，教会可以使用更耐用的材料重建和扩建一系列的教堂，包括圣老楞佐教堂、圣奥斯定教堂和圣嘉辣教堂等。1828年当时在城内的天主教居民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大堂区 2130 人、老楞佐堂区 1720 人和安多尼堂区 456 人，另外城内的华人居民有 8000 人和城外的华人非天主教居民有 22000 人。<sup>89</sup> 天主教和教堂仍然主导着城市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它的欧洲商人主要是信奉基督教，他们也开始建设基督教的宗教设施，包括礼拜堂和坟场等，同时也开展基督教向中国内地传教的工作。当然，澳门作为一个国际的港口城市，其它宗教也有传入，特别是拜火教，他们的坟墓至今仍然保存着。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香港的开埠，大部份的国际贸易商人转移到香港。加之葡萄牙人拆毁城墙，扩充城市的范围，占领 仔和路环，开始澳门的殖民管治，使澳门的近代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sup>88</sup>转引自李金明：〈十七世纪初葡萄牙在澳门的贸易〉载于《文化杂志》第 26 期，澳门文化司署，1996 年。

<sup>89</sup> Maria Calado, Maria Clara Mendes: 《MACAU---Memorial City on the Estuary of the River of Pearls》，Government of Macau, 1985, p.65

## 第二节 华人居住区的形成与发展

澳门原隶属于香山县，是香山大岛伸入大海的一个半岛的顶端，历来与香山岛的发展息息相关。澳门的城市成长于明代，在明朝以前，澳门这个地方十分荒凉，这与澳门所在的香山县开发较迟有关。而且在葡萄牙人到达澳门以前，在地方志上都没有有关村落或任何形式的行政单位的记载。自宋以后，大量的福建人移居香山县，并逐渐成为香山县的主体居民之一<sup>90</sup>。

澳门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其发展在明代。自葡萄牙人居留开发后，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使当时的澳门成为东方最富庶的商业港口。但是，作为一个泊口其始创的时期应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明中叶的澳门尚是一个荒凉的泊口，祇有一些东南亚诸国的商人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同时，在广州港外海如澳门等岛屿与华人进行违禁的私人贸易，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非固定的聚落。

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沿海之前，已经在马六甲与中国商人打交道并进行贸易。占领马六甲以后，在中国领航员的协助下，于1517年8月15日他们由八艘船组成的使节团安全地驶抵屯门岛<sup>91</sup>。当与中国官方建立定期贸易的尝试失败后，葡萄牙人开始在福建海寇商人的招引下在浙江和福建沿海进行的走私活动<sup>92</sup>。因此从一开始葡人与中国商人接触，福建海寇商人就与他们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自朱纨自杀，海禁松弛后，葡萄牙人最终来到澳门，并逐渐成为澳门的实际控制者。当然随着葡人入居澳门，一部份福建商人也因贸易的需要逐渐定居澳门，形成了华人的居住区。而且早期华人居民都是从海路来的商人和船员，因为从陆路来自香山县其它地方的居民，只可以白天进城进行买卖或工作，晚上回原籍居住，并受到香山县官员的严格限制。因此，第一个华人居住区的居民大部份是福建人，随之妈祖信仰也传入了澳门。

明代郭尚宾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奏疏中说道：“乃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銃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划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sup>93</sup>从上述所言可以说明三点：一、福

<sup>90</sup>徐晓望、陈衍德：《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页29。

<sup>91</sup>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中华书局，1988年，页44。

<sup>92</sup>转引自李金明：《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载于《文化杂志》第34期，澳门文化司署，1998年。

<sup>93</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85。

建和广东的逐利之徒不断地移入澳门；二、至万历年间澳门还没有一个农业村落存在，因为一切粮米牲菜等物皆由广州供给；三、葡人到达之前，澳门不是一个渔村，因为这里没有农产品供应或与渔民互市的条件。

后来，随着澳门城人口的增加，为了供应其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澳门城内的外国商人与华人之间的商业活动也渐趋繁荣，并已有集市的形式出现，即在现营地大街的位置。自 1570 年起，越来越多华人转奉天主教，同时大量的日本天主教徒来澳居住和在耶稣会修院内学习，澳门城的居民组成更为复杂。明嘉靖年间的名臣广东人庞尚鹏称：澳门“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sup>94</sup>

居民区的成片出现导致了街道的形成，澳门最早的街道是一条“中贯四维”的十字大街。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九载：“陈督抚又奏，将共聚庐中有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棚，榜以‘畏、威、怀、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门籍。以‘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迹，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为号，东十号，西十号，使亘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诸夷亦唯唯听命。”<sup>95</sup>这条街道的设立，本来是明朝政府为了管理在澳的外国居民而设的。但是由于华人进入澳门者与日俱增，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时，其中“德”字街已为华人入居，至崇祯二年（1629）时，华商则进一步发展至“怀”、“德”二街。有澳门妈阁庙的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横梁上所刻为证：

明万历乙巳年德字街众商建

崇祯己巳年怀德二街重修<sup>96</sup>

虽然在城内的华人居住区和外国人居住区相应地发展，华人居住区主要集中在内港一带，人口也增加到 4,000 人<sup>97</sup>，但是当时的澳门城外仍然是荒芜之地。随着明朝衰落，明清两朝更替之间，大量的内地难民来到澳门(主要是来自广东内地的难民)，人口迅速增至四万<sup>98</sup>。于是天主教城外的荒地得到开垦，随之建立了以农业为经济的华人村落，如望厦村和龙田村。到了十七世纪末，澳门人口达到 19,500 人<sup>99</sup>。有关城外华人居住区的发展，从在 1689 年至 1692 年间创建的普济禅院和设于望厦村的县丞新署的建筑可反映出来。另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宣布开海禁之后不久，清

<sup>94</sup>徐晓望、陈衍德：《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 年，页 36。

<sup>95</sup>转引自汤开建：〈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载于《文化杂志》第 35 期，澳门文化局，1998 年。

<sup>96</sup>谭世宝：〈澳门妈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载于《文化杂志》第 29 期，澳门文化局，1996 年。

<sup>97</sup>Maria Calado, Maria Clara Mendes: 《MACAU---Memorial City on the Estuary of the River of Pearls》, Government of Macau, 1985, p.62.

<sup>98</sup>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Westview Press, 1996, p.81.

<sup>99</sup>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页 36。

政府就在澳门设海关监督行台，其位置在今澳门关前正街，同时建立的税馆也在附近<sup>100</sup>。同时，沙梨头村也慢慢形成。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沙梨头土地庙，初时仅有一石刻祭坛，后来经过多次重修扩大，才奠定今日的规模，庙内的碑刻可以说明沙梨头村的发展。

1723年建成的莲峰庙是一座官商合建的庙宇，显示了中国地方当局对城外华人村落的管治。从这三大古庙都同时主要供奉天后和观音两个神祇来看，澳门的华人人口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

1730年雍正皇帝降旨，准许蛋民在岸上建造房屋，结束了蛋民不能上岸居住的陋习。于是在内港沿岸出现了新的居民点，开始是简单的棚屋，后来才改为类似当地住户的住宅<sup>101</sup>。1749年中国官员规定在澳夷人未经允许，不能建新的房屋<sup>102</sup>。但是，华人居民不受限制，而且在十八世纪后期官、商合建了沙梨头土地庙和关帝古庙，关帝古庙也是“三街会馆”所在地，是澳门最早的华人救济机构。

直至1848年，在天主教城内的华人居住区主要分布在炉石堂街、新马路、清平街、十月初五街至沙梨头一带，华人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望德堂，而且他们与土生葡人社区已经很难清楚划分。城外的有妈阁村、龙田村、望厦村和新桥。1848年以后，随着城区的发展，华人居住区的发展也可以从后期创建的民间庙宇反映出来。

### 第三节 从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融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它在建筑文化史上，可以说是充满了冲突、曲折、融合与痛苦的一个时代，也是百川归海的时代，它标志着中国旧建筑的终结与新建筑的开始，这种剧烈的变动，也许就是一种颇为复杂、丰富的文化现象。而中国建筑文化所走过的历程，除了政治变动对其施以重大影响之外，社会经济嬗变的巨大制约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加上其它文化因素，诸如社会意识、观念及时代思想和学术的转变等等，也会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在建筑文化上打上烙印。<sup>103</sup>尤其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的交融在城市空间、街区和单幢的建筑物都得到充份的反映。

以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郑观应故居）、峰景酒店大楼及烧灰炉炮台、圣老楞佐教堂、圣若瑟修院大楼及圣堂、圣奥斯定教堂、岗顶剧院（伯多禄五世

<sup>100</sup>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页25。

<sup>101</sup> Maria Costa：〈澳门建筑史〉载于《文化杂志》第35期，澳门文化局，1998年。

<sup>102</sup>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页140。

<sup>103</sup>王振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97。

剧院）、市政厅大楼（临时澳门市政局大楼）、仁慈堂大楼、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圣保禄教堂遗址）、哪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基督教坟场、东望洋炮台（包括圣母雪地殿教堂及灯塔）等组成的澳门历史建筑群，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也是最集中的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结合最具特色的历史建筑群，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见证，更是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杰出例子。

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枢纽，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以至远东最重要的传教基地，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贸易重要的国际港口，澳门得天独厚，没有经历重大战争，遗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建筑群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组。这些建筑物，以其历史悠久、中西并存、丰富多样等特色而卓然于世。

澳门历史建筑群最早创建于四百多年前，形式多样，有中式的庙宇、大宅，有西式的教堂、大楼、剧院、炮台、坟场。它们显示了中国民间信仰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延续与变异，和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融合与演变，是西式宗教建筑、军事设施在中国境内最古老和完整的遗迹。它们见证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对话。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中西两种相异文化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这些澳门历史建筑到今天依然延续着原有的功能，成为澳门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它们也是澳门的象征，以其独特的丰姿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澳门。

澳门是中国境内现存西式建筑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反映了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是欧洲文化的传入；其传入时间为16世纪初，而最先到达的地点就是澳门。以葡萄牙商人为主的外国人在16世纪中叶入居澳门，澳门由此发展成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远东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虽然明清两朝曾实施过闭关锁国政策，但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两百多年来澳门都是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重要港口，甚至是唯一的港口。

贸易活动的兴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四百多年间，这里除了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外，还有来自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印度、朝鲜、东南亚地区、甚至非洲地区的人，澳门成为「华洋杂居」的国际城市。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带着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职业技艺，不同的风俗习惯，在澳门城内盖房子、建教

堂、修马路、筑炮台以至辟建坟场，展开多姿多采的生活，其中当然包括各类文化活动。在这种机遇下，澳门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境内接触近代西方器物与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是当时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桥头堡。

随着葡萄牙人的定居，他们把西式的建筑传统越洋带到澳门，使澳门成为西洋建筑传入中国的滥觞。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的城市建筑——房屋、教堂、炮台等无一不显出与西方建筑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文艺复兴后的一些主要建筑形式、风格，结合亚洲其它不同建筑元素在澳门产生了新的变体，形成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为抵御其它西方国家侵占澳门，从17世纪开始便修建城墙、炮台，并且在澳门铸造铜炮，为中国引进了西式军事设施与装备。明、清两朝政府便曾派人到澳门来购买铜炮，以及聘请澳门葡人前往内地教授铸炮、发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

明末清初，大量天主教传教士随葡萄牙人的定居澳门而来到中国，并且以澳门为传教基地，十分活跃地从事远东地区的传教工作，开启了天主教对中国大规模传教的历史阶段。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的修会和国家，其中以耶稣会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大。为了达到「选派懂得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目的，大部分的入华耶稣会传教士都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接受培训，学习华语。于是，澳门云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耶稣会学者，他们带来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人文艺术，并为澳门创造了许多「第一」，如亚洲第一所西式大学、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印刷厂、中国境内第一份外文报纸等等。圣保禄学院及其后的圣若瑟修院更为天主教在远东和中国的传教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中国籍的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罗拔·马礼逊来到澳门，开启了继天主教之后西方宗教对中国传教的另一高潮。马礼逊以澳门为基地，积极学习中文，翻译圣经，编印汉英、英汉字典，更在澳门招收了第一位华人基督教徒蔡高。此后，有十多位基督教传教士相继来澳传教，当中更包括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

可以说，澳门是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地与源头，这在中国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最重视的是，在四百多年的历史里，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合力营造了不同的生活社区。这些生活社区，除了展示澳门的中、西式建筑艺术特色外，更展现了中葡两国人民不同宗教、文化以至生活习惯的交融与尊重。这种中葡人民共同蕴酿出来的温



情、淳朴、包容的社区气息，是澳门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中国其它城市所没有的，即使她跟澳门一样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此，澳门是四百多年中西方人士共同营造的历史城市，而最能代表其历史价值的澳门历史建筑群就是澳门为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留存的一份珍贵遗产。

澳门历史建筑群是东南亚地区仅存的历史见证，也是保存最完整，最悠久的历史建筑群，与澳门同类型的近现代城市如香港和其它东南亚城市，大部份历史建筑由于受到不适当的现代化而破坏乃至湮没了。

澳门历史建筑群大部分保存良好，现存基本都是历史原物。这些建筑物及建筑群建于不同时期，19世纪末已大致定型。在日常对建筑物的维修保护中，严格遵守“不损害其原有特征”的原则，参照历史文献、图片，以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在设计、材料、工艺、风格等方面致力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建筑群方面则注重周围环境的配合，尽量保持原有的氛围。因此，总体来说这些澳门历史建筑群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貌和风格。

#### 第四节 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

一、澳门历史建筑群以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筑遗产为主，又保存着有澳门地区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

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历史建筑群有着许多“中国之最”。如：圣老楞佐教堂、圣奥斯定教堂、玫瑰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建筑，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筑。圣若瑟修院是现存中国最古老而保持完整的修道院。大三巴牌坊是中国最古老的教堂遗址。以大炮台为代表，包括东望洋炮台、烧灰炉炮台在内的西式炮台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炮台群。基督教坟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属基督教的坟场。岗顶剧院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东望洋灯塔更是远东地区第一座灯塔，至今还在使用中。

可以说，澳门历史建筑群是西式古老建筑在中国最集中的展示。

此外，有人说澳门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澳门历史建筑群应是最能体现这个美誉的代表了。在这片面积细小的区域里，妈阁庙代表了中国岭南风格的庙宇，郑家大屋则代表着清末院落式风格的富商大宅。西式建筑物方面，更包含了文艺复兴以后大部份的欧洲建筑形式。如圣若瑟修院圣堂、玫瑰堂的巴洛克式；峰景酒店大楼、圣老楞佐教堂、岗顶剧院、市政厅大楼、仁慈堂大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等；而最独特的地方是，澳门的西式建筑在上述风格的基础上又揉合了印度、日本以及中国

沿海地方的建筑特色，表现出结合亚洲当地元素而产生的变体，如港务局大楼、圣奥斯定教堂、大三巴牌坊等等，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可以看到，作为具有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澳门，保存了一批反映欧洲特别是葡萄牙建筑特色，以及中西合璧的建筑物，也保存了极具澳门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是品类最全、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平较高的东方城市。

二、澳门历史建筑群是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以至远东地区发展的重要见证，并且反映了别树一帜地方性的中国民间信仰和社会形态：

自从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澳门一直是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的基地，涉及到耶稣会、圣奥斯定会、圣多明我会等不同天主教修会。今天的圣奥斯定教堂、玫瑰堂均有过去天主教修会会院的遗址。由大三巴牌坊和大炮台共同构成的圣保禄修院遗址和圣若瑟修院见证着天主教中国传教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事迹。圣老楞佐教堂、圣若瑟修院圣堂、圣奥斯定教堂以及玫瑰堂组成中国最古老并且至今仍然运作的天主教教堂群，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至于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其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牧师除了以澳门为传教基地外，其遗体亦是葬在澳门的基督教坟场内，可见澳门与基督教的渊源深厚。

澳门最原始的民间信仰是对海神的崇拜，妈阁庙的妈祖崇拜是最好例证，表现了澳门与中国闽粤沿海居民妈祖信仰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因应环境和历史的演变，澳门的妈阁庙在中国众多的妈祖庙中又别具特色。首先，它是官商合建的宗教建筑，不是单纯的民间私建，跟中国其它地方的传统不同。其次它虽是以天后信仰为主，庙内却兼有观音、土地、阿弥陀佛等等，更有一座佛教的“正觉禅林”，充分体现了澳门地区独特的民间神庙与佛寺禅林融合与兼容的特点。

三、澳门历史建筑群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反映，是中国历史城市中极具特色的组合：

从澳门历史建筑群的分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集合多种不同思想信仰、生活习惯的居民生活空间。供奉中国海神的妈祖庙与西方海神的圣老楞佐教堂相隔咫尺；葡萄牙人生活区的亚婆井旁有着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大宅；圣若瑟修院培养了大批中国籍修士；岗顶前地上有葡人“大会堂”的岗顶剧院，也有中国富绅何东的旧居；议事亭前地至今还是澳门华洋市民欢庆集会的中心广场；与美丽的玫瑰堂相邻的是澳门华人最早的市集营地街市；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并立的是精致小巧的哪吒庙；东望洋炮台的圣母雪地殿教堂则有着结合西式内容中式图案的壁画——总之，中西兼融、相互尊重，正是澳门历史建筑群的特色。

再仔细分的话，在这些建筑群中，有耶稣会、圣奥斯定会、圣多明我会等不同修会的教堂；更有基督教的基督教坟场教堂。而中国的妈阁庙里也有座观音殿、土地神——在短短的距离里「缩龙成寸」地容纳着不同文化，保存着不同特色的纪念建筑，并且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相映成趣，这就是体现澳门尊重多元文化、共存互补这当代世界潮流的最佳例证。

#### 四、澳门历史建筑群是中西生活社区有序的组合：

澳门半岛是个面积细小的地方，却容纳着不同的文化、宗教以至生活习俗。城市空间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作为一个中西文化并存的城市，澳门现存的一些城市空间，正体现了昔日中、葡以及其它国籍居民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记忆。

澳门历史建筑群包括妈阁庙前地、亚婆井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白鸽巢前地，构成一组完整的组合，东西兼备，连贯紧凑，错落有致。当中，以议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营地街市三位一体而形成的空间综合体最为独特，具有明显的南欧中世纪城市中心空间的特征，就是政治、商业、宗教三位一体，是整个城市的心脏地带，其空间的南欧色彩为亚洲城市中独一无二。如果注意到高楼大厦已经湮没了具有相同历史与建筑风格的许多其它东方城市，澳门保存历史与文化的成果就显得难能可贵。

## 参 考 书 目

### 一、中文论著：

1. 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3.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5年。
4. 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校注》，赵春晨校注，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2年。
5. 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7月。
6. 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教育出版社。
7. 《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澳门博物馆出版，1998年。
8. 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
9. 张天泽著，姚楠、钱江中译：《中葡早期通商史》，中华书局，1988年。
10.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 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 张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3.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
14. 罗哲文、杨永生：《失去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15. (日)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局，1995年影印本。
16. 古万年(Custodio N.P.S Conim)与戴敏丽(Maria Fernanda Braganca Texeira)著：《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出版，1998年。
17. 刘芳辑、章文钦校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出版，1999年。
18. 黄就顺、邓汉增、黄钧燊合编：《澳门地图集》，澳门基金会出版，1997年。
19. 《澳门文化特色的左证》，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7年。
20. 《澳门的教堂》，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3年。
21. 《乔治·钱纳利——十九世纪的澳门》，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7年。
22. 周景濂编著：《中葡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23. 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七世纪》，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

24.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年。
25. (瑞典) 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炎、沉正邦合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
26. 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
27. (葡) 曾德昭著，何高济、李申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8. 潘日明神父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2年。
29.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着，金国平译：《远游记》，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联合出版，1999年。
30. 菲基立撰文，王薇译：《澳门建筑文物》，澳门文化学会出版，1988年。
31. 林子升编：《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88年。
32. 汤开建等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33. 《文化杂志》第1~42期，澳门文化局，2002年。
34. 王振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36. 徐晓望、陈衍德：《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8. 李平白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
39. 崔世平、赵炳时：《21世纪澳门城市规划纲要研究》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1999年。
40. 魏清源等：《世纪之交的珠江三角洲行政区划》广东地图出版社，1997年。

## 二、外文论著：

1. Charles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1550-1770*.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Charles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ao: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1959.

3. Charles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1969.
4. Charles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Kong, 1984.
5. J. M.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Hong-Kong, 1949.
6. Michael Hugo Brunt, *Architectural Survey of the Jesuit Seminary Church of St. Paul*. Hong-Kong, 1954.
7. Austin Coates, *A Macau Narrative*. Hong-Kong, 1983.
8. Jorge Graca,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their Design and History*. Macau, 1969.
9. Jorge Graca, *Fortificacoes de Macau---Concepcao e Histori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10.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u*. Hong-Kong, 1902.
11. Wong Shiu Kwan, *Macau Architecture: An Integrate of Chinese and Portuguese Influences*. Macau, 1970.
12. Maria Calado, Maria Clara Mendes, *MACAU---Memorial City on the Estuary of the River of Pearls*. Macau, 1985.
13.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Westview Press, 1996.
14. M. Manuel Teixeira, *Toponimia de Macau*. V1, Macau, 1979.
15. M. Manuel Teixeira, *IV Centenario dos Dominicanos em Macau 1587-1987*. Macau, 1987.
16. Domingos dos Santos 《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4年。
17. Basto de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oria de Macau*. V3, Macau, 1993.
18. *De Longe a China*. V2,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19. Antonio Bacarro, *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e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 .V2,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1992.